

當代港澳

STUDIES ON HONG KONG & MACAO



2007

第一期

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

当代港澳
2007年第1期
(总第28期)

目 录

本刊顾问:

许锡挥 郑佩玉

主 编:

陈广汉 周运源

副 主 编:

陈丽君

袁持平

郭天武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

三角洲研究中心

电 话:

(020) 84113279

E-mail:

puhkmac@mail.sysu.edu.cn

邮政编码:

510275

登记证号:

粤O第1105号

刊 期:

逢6月15日

12月15日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

2007年6月15日

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专刊

香港回归后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陈广汉 张应武 (1)

“一国两制”在香港政治中的实践

——回归十年香港政治发展总结 陈丽君 (7)

回顾十年前的思考..... 许锡挥 (12)

繁荣发展人心聚,再领风骚向未来..... 周运源 (14)

“变”与“不变”:香港回归十年回顾展望 黎熙元 (17)

大香港主义和“边缘化”危机..... 郑佩玉 (22)

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经贸合作关系的

回顾与展望..... 袁持平 田甜 尹丽丽 (26)

香港经济再发展的哲学思考..... 彭国题 (31)

香港总部经济的发展

——对香港国际商务之都的微观分析..... 关红玲 (36)

浅析新时期香港的投资环境..... 尹丽丽 (42)

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及其防治对策 郭天武 陈迪 (48)

民建联:《强化即时转运》报告的读后感..... 郑天祥 (54)

畅所欲言、集思广益,香港明天会更好

——“香港回归1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周多天 杨广 (55)

信息动态..... (60)

本刊声明

·本刊所发表署名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本刊所刊登的图文均保留版权,请勿擅自转用。

香港回归后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陈广汉 张应武

一、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的基本特征及其原因

回归十年间,香港经济的发展历程可总结为“抵御冲击、逐渐复苏、稳定增长”的过程。香港在回归后,相继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影响与全球经济增长减缓、“非典”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冲击,经济发展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但困难时期,在特区政府和广大香港同胞的努力以及中央政府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下,香港克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经济得以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好转以及CEPA的签署和实施,在内地经济增长的带动下,2003年以来香港经济迅速复苏并持续增长,财政收支基本实现平衡,通货紧缩基本结束,香港经济步入了平稳发展的轨道。今天的香港依然保持着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被公认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①。

根据香港1997-2006年宏观经济的基本数据(包括GDP以及人均GDP的绝对值和增长率、失业

率、消费者物价指数、政府财政收支等),我们绘制了如下几幅描述回归后香港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从图1-图3可以明显看出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的基本特征:

1、从经济增长率看,不论是GDP增长率还是人均GDP的增长率,不论是名义增长率还是实质增长率,香港经济在1997-2004年间明显遭受了两次冲击并相应经历了两次恢复,表现出“W型”的发展特点,随后,从2005年起香港经济开始走向平稳增长。另外,香港经济的实质增长表现要好于名义表现,除1998年外,香港实质经济增长率虽然起伏不断,但始终是正增长,但是名义增长率在1998-1999、2001-2003都为负值。

2、从物价指数看,香港经历了长达6年的通货紧缩,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在1999-2004都呈现负增长,但从2005年起香港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物价指数在大部分年份都为负数,但从图形上看也表现出类似经济增长率的“W型”发展路径。

3、从就业市场看,1997-2006年,香港经济的失业率表现出“倒W型”,跟经济增长的变动基

^① 范尚禧,失业问题的根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季报》,2004年第2期。

本同步,即增长率高时失业率低,反之亦然。失业率在2003年的高峰之后正稳步下降并走向平稳。不过,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的影响,香港的自然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的幅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2006年,香港失业率仍为4.8%,远高于回归前的水平。

4、从政府收支看,政府收入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类似于“W型”的变化趋势,但财政支出在1998年扩大后基本保持稳定。由于收入减少而支出不变,香港回归后政府收支出现了五年赤字,其中以2001-2002、2002-2003财政年度最为严重。随着经济的复苏,从2004-2005财政年度起,财政收支基本实现平衡。

总之,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的基本特征就是“波动—恢复—再波动—再恢复—最后走向平稳”,各项指标均呈现出明显的“W型”或“倒W型”特点。

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的原因

回归后香港经济之所以会起伏不断,呈现出“W型”或“倒W型”的特征,主要是因为香港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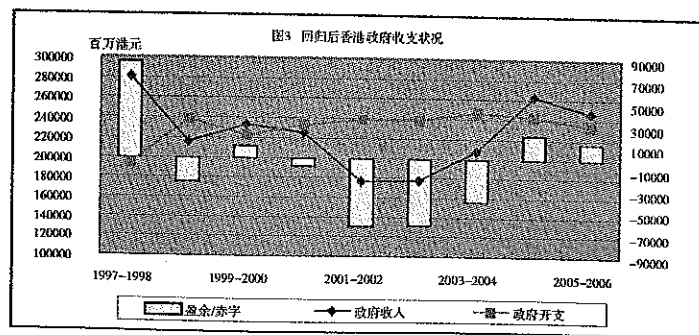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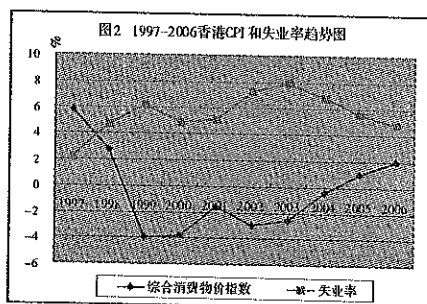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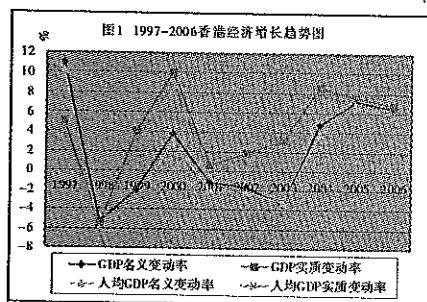
归后遭受了一系列外部经济冲击以及其内部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制约的结果。

1、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的外部原因

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对外部经济的敏感度高。香港回归十年中,经济的衰退明显跟金融危机、SARS、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等外部冲击紧密联系,而经济的复苏也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全球经济的回暖等外部支持。

由于承袭以往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惯性,1997年香港的GDP实质增长率仍达到5.1%。香港回归后,恰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时间楼价和股市大跌。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的1998年,GDP实质性负增长5.5%,这是香港近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1999年,由于内地经济成长并带动香港的航运和外贸发展,香港获得了4.0%的GDP实质增长。此后,受2000年国际信息科技产业发展前景乐观预期的影响,香港经济开始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股市投资气氛开始活跃,香港的股市节节攀升,与此同时,香港紧跟美国网络热潮,在香港兴起了一股网络投资热。股市的恢复与科技股投资热的兴起,使香港内部的投资气氛得到很大改善。这一年,香港的

GDP强劲反弹,增长幅度高达10%。然而,从2001年三月份开始,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泡沫爆破,美国两大股票指数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持续暴跌,美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衰退调整期。美国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着香港的出口或转口贸易发展,同时,美国股市的暴跌也使刚刚有了起色的香港股市顿时陷入了深渊。与此同时,



日本经济仍旧停滞不前,而欧洲经济也步入了萧条期。世界经济的三大体系同时步入低迷状态,再加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及世界经济前景暗淡难测,沉重的打击了香港这个有着极高对外依存度的小型经济体系。受此影响,2001年香港经济急转直下,GDP只增长了0.6%,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02年,美、日、欧经济不景气继续,加之由于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世界石油价格波动不定,香港经济虽然比2001年有了一些改善,GDP也仅增长1.8%。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更是将本不景气的香港经济打入冷宫,使香港经济运行进入谷底。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政府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议,及时采取了开放部分内地居民来港“自由行”等措施,使香港经济很快又出现了逆转势头,香港全年的GDP增长达到3.2%的水平。2004年后,在CEPA和国际经济复苏的刺激下,香港经济连续三年高速增长并逐渐走向平稳。

2、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的内部原因

从内部原因看,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受到了其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表现在香港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以及回归前累积的经济泡沫无法消化等等。

香港回归前,产业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回归后,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更加显著,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和就业中所占比重都有上升。一方面,香港的制造业进一步趋于收缩,不仅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近一半,到2005年仅占3.4%,其绝对值也从1997年的817.2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455.5亿元,减少了44.3%;另一方面,2006年香港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91.1%和86.2%。从香港服务业的内部结构看,占主体地位的是进出口贸易、运输及仓库、金融保险及商用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占到服务业总量的70%左右。^①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归根到底是一个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产业,没

有制造业,服务业便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由于香港缺乏制造业基础,经济的发展必然依赖于服务业的出口,必然导致香港经济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2006年,香港的商品贸易总额/GDP已经达到400%,服务贸易/GDP也达到57.5%,较回归前都显著上升。另一方面,香港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还表现在对房地产业的严重依赖,虚拟资产迅速膨胀。香港回归前地产、股市泡沫已达到最高峰,整个香港社会仍然陶醉在泡沫经济的狂热之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九十年代后,香港40%的银行贷款投入了房地产,金融危机爆发前,地产股票市值占到港股市值的32%,金融股市值占23%。然而亚洲金融风暴使楼价、股价暴跌,香港陷入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要平抑香港过高的营商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必须足够下调香港的物业价格,挤掉由于资产价格膨胀导致的经济泡沫;但楼价大幅下跌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市民的收入、消费和心理预期,通过银行借贷影响金融机构运作,甚至通过土地拍卖影响政府的收入。

3、回归后香港经济波动的制度性原因

联系汇率制度是金融危机后香港连续通货紧缩和经济不景气的制度性原因。在联系汇率制度下,当周边地区的货币出现大幅贬值时,香港不能通过调整调整汇率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提升经济的竞争力,也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不得不忍受长时期的资产和要素价格下降的痛苦,从而延长了经济危机的时间。联系汇率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联系汇率制度对于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功不可没,同时它也是香港回归后经济持续萧条的重要因素。

香港自1983年就开始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利于降低贸易的汇率风险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

^① 陈广汉、张应武,香港经济转型,“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回归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有利于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曾对香港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香港回归后,由于金融危机的等冲击,香港经济却因联系汇率制度付出了惨重的成本。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经济波动的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这是因为,在联系汇率下,香港一方面要维持固定汇率,另一方面又要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根据“三元悖论”原理,香港必然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失去了政府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在金融危机中,由于联系汇率制度,香港采取了放弃利率保汇率的对策,为了抑制投机,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隔夜拆借利率最高达到300%,导致恒生指数暴跌,楼市价格下挫,使危机过后香港出现了持续的通货紧缩,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中。此外,由于无法调整汇率,香港面对竞争对手货币大幅贬值或出口市场经济衰退的冲击无能为力,使香港的出口和旅游业在危急中受到严重影响。在联系汇率制下,香港依靠财政政策拉动需求的力度也受到限制(当然,香港的简单低税制也不允许香港大面积使用财政政策),因为,持续的财政扩张将会导致财政赤字并最终积累成沉重的利息负担,受制于联系汇率制度,政府无力将赤字货币化。

二、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忧

从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增长情况来看,虽然经济表现大起大落,起伏不定,但总的趋势仍呈上升势头。香港经济不仅经受住了重重打击和考验,而且还做到了有所发展,有所进步,这是不容否定的。但必须指出,香港能够有今天的稳定局面,与内地对香港的强大支撑是分不开的,没有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没有内地经济对香港的带动,香港目前的局面可能要严峻得多。同时,香港经济回复和繁荣,也证明了香港市场经济制度的活力和自我调解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香港经济虽然已经走出了狂风暴雨,但经济结构矛盾

并没有根本的解决,经济转型缓慢乏力,经济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极多隐忧。

1、香港经济转型的方向模糊

香港信奉自由经济,一直以来很少有人去关心及探讨经济转型的问题,认为这应该由市场决定,通过市场力量调节私人经济活动能使经济达到最优状态,政府也奉行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反对干预经济。虽然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过度依赖地产业发展的香港经济,使香港充分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但是,对于香港经济转型的方向社会各界是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政府对经济转型也没有明确的认识,以至没有实质性的有效的政策措施。目前,对香港经济转型方向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观点:^①一类是主张发展以知识为本的高增值产业,特别是高增值服务业。1998年政府提出的发展创新科技以及2001年财政司长提出的“超级曼哈顿”(Manhattan Plus),还有新近提出的发展创意产业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意见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潮流,并立足于香港高成本的现实,但忽视了香港存在科技基础薄弱、劳工素质不高等现实因素,解决不了大量低技术、低技能劳动人口的出路问题(对政府来说,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充分就业同等重要);另一类则主张发展二元经济,一元是高增值高效率的部门,另一元是低增值高就业的部门。二元经济论、新工业化、工业回流、4+1模式(即四大支柱产业+新工业)、本土经济等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意见照顾到香港劳工市场的现实,立足于解决大量低技术劳工的出路,但回避了高成本的问题,在实际中难以取得成效。可见,香港经济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明确经济转型的方向,必须将香港高增值和高就业产业统一起来考虑,必须遵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分工发展的原则和潮流,必须

^① 摘自中银发展规划部报告。

资料来源: <http://www.price007.com/data/231.htm>。

有利于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及提升香港经济效率。

2、国际金融中心虽然优势明显，但也面临很多新问题

香港是国际十大金融中心之一，是排在伦敦和纽约之后第二梯队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依然存在，并又有所提升。譬如区位优势方面，香港与伦敦、纽约三分全球，在时区上互相衔接，与新加坡、东京各处东亚南北端不同，香港位于东亚中心，香港背靠中国大陆这个发展迅猛的经济体；制度优势方面，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拥有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香港还拥有优异的金融环境，产权明晰、信息透明、交易成本低等。^①香港回归后，金融业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6年，香港股市市值超过多伦多和法兰克福，成为全球第六，IPO更是超过纽约成为全球第二，但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面临一些新问题。首先，随着内地股票和债券市场不断完善，以及金融市场走向全面开放，香港如何处理与内地金融中心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地的竞争与合作成为新问题。其次，与伦敦、纽约相比，香港金融业从结构上看银行业并不逊色，但资本市场发展远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香港经济基数太小；受限于内地资本管制，进入市场受到限制；香港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限，特别是定息及衍生工具市场发展不成熟。^②因此，如何在保持现有自由、开放及国际化金融制度的同时与内地经济金融市场取得衔接，从而克服本地市场窄小的新问题。此外，在联系汇率制度框架下香港如何维持港币和人民币的稳定，特别是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如何强化作为内地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和配合人民币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抑或发展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也将成为一个新问题。^③香港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地发挥在内地金融改革和开放中的作用。否则就有可能面临被超过或取代的危险。

3、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地位面临新加坡和内地的激烈竞争

作为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香港国际机场自1996年来一直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空货运中心，航运货柜吞吐量在过去15年中12年居世界首位，但是，2005、2006年这一殊荣被新加坡所取代，香港的物流中心地位越来越受到新加坡和中国内地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挑战。^④香港物流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自由贸易港制度，以及经过几十年发展建立起来的良好物流基础设施、一流的运作管理、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和通达全球主要港口的国际海运网络，同时建立起了包括金融、保险、第三方物流、中介以及纠纷仲裁等环节的完善服务体系。但是，由于香港制造业外迁，香港贸易和物流业服务的货源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加之香港本身高昂的物流成本（比如拖运费和码头处理费）和粤港两地繁杂的清关手续已成为香港物流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近年来内地港口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物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上海、深圳在短短几年内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四大集装箱港。以深圳与香港比较为例，深圳的要素成本同香港相比，有明显的优势，但制度成本要高于香港；至于生产要素的质量，深圳的“硬要素”差距不大；对于中低端物流业务，深圳的竞争力正在接近甚至超过香港，原本在香港境内完成的业务越来越分层次的通过离岸贸易的形式逐步转移到深

① 2006年国际证券交易联合会调研认为香港拥有与纽约和伦敦抗衡的五项优势是：金融条例较美国宽松；资金货币自由兑换和流通；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联系内地与“珠三角”工业重镇；税率比美国和英国低。

② 何东、杨翠微、林崇智，2006，“香港与纽约金融业产值及就业比较”，《香港金融管理局季报》第一期。

③ 谢国梁，2007，“细数香港金融中心十年”，“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回归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④ 新加坡跟香港一样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一流的人才以及先进的供应链管理，两者竞争力旗鼓相当，但新加坡跟香港并没有太大的直接竞争关系，但内地与香港货源相同，直接对香港物流业的发展形成挑战。

圳和珠三角^①。

4、珠三角的港资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香港的制造企业大举北迁进入珠三角,为珠三角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为香港发展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珠三角的港资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在内地大多从事外向型加工生产,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许多港资企业技术创新和开拓内销市场的能力不足,对内地政府税负方面的优惠政策有较高的依赖性。目前,珠三角正处于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节点上。广东省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促进工业产业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推进产业聚集,填补和增强产业链高端链节,提升产业层次,培育知名品牌,提高管理水平,实现产业发展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与此同时,中央也明确提出广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此,广东省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珠三角地区未来投资的门槛(包括利用外资)、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等,国家也在税收、加工贸易政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对港商的影响非常大,部分港资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如何配合珠三角的港资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之在广东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或者将腹地进一步向内地延伸扩大,通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与内地九省区加强联系以形成新的竞争力和产业优势,这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5、政治纷争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政治安定是经济稳定并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纷争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资及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以刺激经济发展。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成为影响香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在落

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社会争议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香港回归后由于受外部经济冲击和内部经济结构和转型的影响,经济几起几落,而每当香港陷入困境时,中央政府都伸出援助之手,正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回归后香港经济才能有今天的繁荣局面。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经济乃至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香港应该投入更多精力保持稳定,避免政治纷争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香港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繁荣发展,必须要解决好以上几个问题。为此,政府应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有所作为,根据新经济转型的特点和要求,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切实成为高增值产业的创造者、引导者、促进者;香港必须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提升与内地经济合作的水平,拓展香港经济的腹地;同时,香港要吸引各类人才,为香港经济转型服务,促进高增值产业发展;此外,香港必须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我们相信,只要香港各界共同努力,香港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香港的未来一定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周多天)

^① 韩彪,“深圳与香港物流业竞争力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06年第10期。

“一国两制”在香港政治中的实践

——回归十年香港政治发展总结

陈丽君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思付诸实践的第一地区。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只有一个国家主权,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各级地方政府由国务院统一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实行与国家主体不同的制度,但不改变中国单一制国家本质,可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体现了高度创新性。经过十年的实践,其在政治上究竟成效如何,本文将对此做出分析。

一、香港政制架构与制度得以维持和发展

1、政府架构、制度维持不变

回归后,原有政制架构、制度维持不变。香港特区政制架构、制度、功能等与港英政制基本一致。行政长官取代总督,仍为行政首脑,且保留其立法、司法方面的大部分权力。行政局回归后名称改为行政会议,过去为总督咨询机构,回归后则为行政长官咨询机构,行政长官做出的决策决定需要在行政会议上讨论通过。立法会组成、权力、运作与回归前基本一致,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听取行政

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就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进行辩论。司法系统架构、运作等也基本维持不变,香港仍属于普通法系,原有各级法院、审判权限、审判程序及各项制度均维持不变,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得以完整保留,有所改变的只是成立香港终审法院取代英国枢密院。行政系统的架构、权力、运作、制度等也基本维持不变,纵向三层架构、横向三大系统得以完整保留,2002年推出的高官问责制度,只是将司长、局长脱离公务员队伍,成为政治任命的官员,改变高官缺乏问责弊病和似是而非政治中立,局级以下官员包括多数局级高官仍属公务员,他们的职责仍是行政事务,且整套公务员体制维持不变,其中最重要的公务员中立、常任、专业、务实与廉洁这些香港公务员制度精髓得以完整保留。其他独立机构包括廉政公署、审计署(回归前为核数署)以及400多咨询委员会均得以保留,组织、功能、性质、权限均未变,如廉政公署、审计署仍然只向行政长官(回归前向总督)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2、特区政制保留了原政制中精华,去除了殖民色彩因素,确保了回归以来运作顺畅

回归后,香港管治权由英国人变为港人,即

由英国人治港变为港人治港,去除了殖民色彩因素。首先体现在行政长官必须是香港人及行政长官由港人选举产生并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使行政长官不仅要向中央负责,且需向港人负责并受港人监督,这就促使行政长官在管治香港时要多为港人的利益着想,这比英国政府委任的只需向英国政府负责的港督已好得多。其次,政治架构中主要成员均为香港人,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各局局长、警务处长、入境事务处长、海关关长、审计署署长、廉政专员等)、终审法院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80%以上成员均须是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而在政府各部门任职的公务员则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除某些专门的和技术的职务外)。港人利益与香港息息相关,且更了解和熟悉香港,由他们管治更有利。第三,体现在除了外交、防务等涉及国家主权的事务,香港内部各类事务的决定权、管理权均在特区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权等。且特区政府相对港英政府,权力有所增加,最明显的是司法权增大,过去一直掌握在英国枢密院的司法终审权,回归后已属于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第四,回归前政治架构中不同国籍成员待遇不平等,英籍公务员占据政府各部门的重要位置,且享受不同其它公务员的特殊待遇,回归后特区政府使全体公务员享有平等的机会与平等的待遇,更利于公务员竞争及才能的发挥。

因此,特区政制保留了港英政制中行之有效的架构、制度,改变的是殖民色彩的东西。因此,由港英政府过渡为特区政府后,政府各部门能一如既往地保持高效运作,特区政府办事效率已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第一;政府独立部门廉政专员公署等依然发挥其特殊作用,廉政专员公署仍然是香港市民中威信最高的部门;立法机构不仅在完善香港法律体系方面发挥作用,且有效地发挥了监督政府的作用;司法系统则在维护香港法制

方面一如既往地发挥着有效作用。

二、香港民主制度得以发展

1、行政长官选举选民基础不断扩大,特区政府施政日益贴近民意

香港回归祖国后,港人成为香港真正的主人,民主制度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

第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由特区筹委会进行资格审查,选出8名参选人,包括吴光正、董建华、杨铁梁、李福善四大热门人选,1996年11月15日,400人推选委员会提名,董、杨、吴获超过50个提名,成为候选人,1996年12月11日在不记名的投票选举中,董建华获320票当选香港第一届行政长官。

第二届行政长官选举在2000年上半年举行,有3位人士宣布参选,其中包括在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董建华在有效提名期内共取得714名选举委员提名(占委员总数794人的89.92%),作为唯一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而自动当选第二届行政长官。2005年3月董建华因身体健康原因而辞去行政长官职位,随后进行行政长官补选,2005年6月16日提名期结束,曾荫权取得674个提名及36份支持同意书,成为唯一候选人,因此自动当选行政长官。

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在2007年3月举行,行政长官候选人不仅面对800人选举委员会,且举办了两次可与美国总统选举媲美的候选人电视直播公开论坛。结果曾荫权在高提名、高民望、高票下当选。

回归前,港英政府施政很少咨询民意。回归后,尤其是2002年高官问责制推行后,主要官员要为其政策负上政治责任,因此他们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了解民情民意,以使其制订的政策能获得立法会通过,这就使政府的政策较易符合香港社会发展的需要。曾荫权在第三届特首选举中获得连任后,更强调政府施政以民意为依托,承诺由下而上制订政策。

2、立法会选举直选议席不断扩大，议政环境日趋宽松

香港回归祖国后，由于英国单方面改变香港政制安排，搞出政改方案，并据此产生1995年立法局，中国政府不得不另起炉灶，因此回归后未代立法局议员全部“下车”，取而代之的是临时立法会。根据基本法附件二的规定，1998年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产生，直接选举议席为20席，2000年第二届立法会直接选举议席增至24席，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直接选举议席增至30席。

回归后议政环境较港英时期宽松很多。回归前港英当局的立法局议员出于仕途或利益考虑，基本跟随港督旨意，唯命是从，尤其在政制议题上完全没有自己的观点。回归后港人当家作主，议员完全不会跟随行政长官旨意，而是根据民意，民意的分歧反映在立法会内，使立法会经常出现激烈辩论，在民主进程及政制问题上，更是百花齐放，畅所欲言。这充分表明香港民主进程已经向前跨进了一步。

3、区域组织选举议席扩大，参与竞选人数不断增加

香港区议会是政府地区事务的咨询机构，本质是社区服务，全港共有18个区议会，每个区议会又分成十数个小选区，每个小选区可选出1个区议员。

1999年11月特区第一届区议会选举，设390个选区，共390个民选议席，有798名候选人参与角逐。2003年11月特区第二届区议会选举，共设400个选区，400名民选议员，有837名候选人参与角逐，74个选区因无人竞争而自动当选，其余326个选区的议席有763名候选人竞争，平均2.16人竞争一议席，不少选区4人竞1席位，为历届区议会选举竞争最激烈的。

4、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选民基础不断扩大，选举程序日趋开放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香港居

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可见香港公民不仅参与“治港”，且参与“治国”。

根据全国人大1997年3月制定的九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回归后第一次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由选举会议选出，选举会议由第一届特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临时立法会议员三部分424人组成。1997年11月提名期内，有72名参选人符合选举办法规定，超过了差额选举人数不能多于正式代表二分之一的规定，12月6日进行预选，产生54名候选人，12月8日正式选举，36人当选。2002年第二次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选举会议成员956人，11月提名期间，99人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选人登记表》，其中78人获10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提名，11月29日举行预选，12月3日正式选举，36名候选人当选。2007年3月人大常委会公布第十一届港澳地区人大代表选举办法规定，选举会议成员将有1300多人，取消预选，2008年1月以直接投票方式选出港区代表。

可见，港区人大代表“选民基础”不断扩大，由424人至956人，至1300人，且取消了预选，只要选举会议成员10人以上联名便可提出候选人，一轮投票即分胜负。

三、港人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均大幅度提高，政团政党政治取得发展

1、港人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均大幅度提高

早期港人大部分是内地移民，普遍抱有难民心态，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积极性，且港英政治本质是殖民统治与专制制度，封闭的政治体系阻碍了市民对政治权力的参与，因此导致港人政治冷感。20世纪70年代后，移民的后代逐渐成为人口的主体，他们移民意识已淡化，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非殖民化过程及选举政治产生，使香

港市民越来越体会到香港前途问题与其切身利益相关。

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实施,使港人真正成为香港的主人,且民主政制进一步发展,这些促进港人参政意识不断发展。从表1、表2可见,区议会与立法会选举选民投票率增长相当快,回归后尤为突出。1999年11月特区第一届区议会选举举行,228万名合资格选民,有816503人前往投票,投票率35.82%,与港英时代1994年区议会选举比较,投票人数增加12万人,高出2.7%。2003年11月特区第二届区议会选举,新登记选民达20余万,投票人数106.5万人,投票率44.05%,为香港历届区议会投票率之最。1998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分区直选中,280万选民中近

149万人投票,投票率高达53.29%;功能界别选举,77813人参与投票,投票率63.5%;选举委员会的800名委员790人参与投票,投票率达98.75%。2000年第二届立法会选举,分区直选登记选民为305万人,其中133万人参与投票,投票率43.57%;功能界别选举,登记选民163026人,投票人数92112人,投票率56.50%;选举委员会选举,投票率95.53%。2004年第三次立法会选举,分区直选投票人数高达178万多人,投票率达55.63%,创香港历届议会选举投票率最高纪录。与此同时,选民投票倾向日益成熟,如果说,早期还有较多选民选举目的不明确,随大流,现在越来越多人有明确选举目的,习惯于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和表达诉求。

表1 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变化

年份	1994年	1999年	2003年
选举投票率 (%)	23	35.82	44.5

表2 市政局与立法机构选举选民人数与投票率变化

年份与选举类别	最后一届旧式市政局选举	1983年市政局选举	1991年立法局选举	1995年立法局选举	1998年立法会选举	2000年立法会选举	2004年立法会选举
登记选民(万人)	3.4	70	191.7	257.21	279.54	305.54	319.97
投票人数(万人)	0.6	12.7	75	92	148	133	178
选举投票率 (%)	14.7	22	39.15	35.79	53.29	43.57	55.63

2、政党政治取得发展

在港人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基础上,香港政党政治也取得发展。上世纪8、90年代港英政府引入了区议会及立法局选举,加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提出,香港一批中产阶级开始组建政团,1983年成立汇点,1986年成立民协,1990年成立港同盟,1994年港同盟与汇点合并成立民主党。而一批工商界人士则于1991年在立法局内组织成立启联资源中心,1993年成立自由党。一批与中

国内地关系密切的社团与人士于1992年组建民主建港联盟,1994组建香港协进联盟。

回归后,香港政党政治取得了较大发展,从表3可见,公民党与社会民主连线2006年才成立,而民建联2005年与港进联合并,成员数已经由回归前的2000多人大幅增长到近万人,且这些政党在立法会的议席达到40席,占立法会总议席已达三分之二以上。

表3 香港主要政党情况表

政团(政党)名称	成立日期	回归前成员数	目前成员数	成员成分	04年立会成员数
民建联	1992	约2000	约10000	劳工基层人士为主	12
自由党	1993	约800	10000余	工商界为主	10
民主党	1994	600多	650	中产人士为主	9
民协	1986	100多	100多	中产人士为主	1
公民党	2006		250	中产人士为主	6
社会民主连线	2006		200多	基层人士为主	2

四、国际社会与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幅度提高, 政治形势保持稳定

1、国际社会与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幅度提高

港人在回归前担心“一国两制”难以落实, 不少人移民海外。然而香港回归祖国后, 中央政府严格履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承诺, 不干预香港事务, 香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维持不变, 生活方式维持不变, 港人最重视的“自由、法制、人权”等均得以维持, 香港仍然是世界最自由地区, 仍然是法制健全地区, 港人“游行示威”等各项权利均得到尊重, 回归后中央与内地省市府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 由此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担心与忧虑基本消失。英国近年公布的有关香港问题的报告, 均认同香港的“一国两制”得到贯彻落实。2007年5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嘉晴访问中国时表示, 香港回归的10年是成功的10年,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政策是成功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持香港独特的生活方式, 香港依然是亚洲最自由的城市之一。欧盟也表示, 中国政府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回归前的1995年6月, 美国《财富》杂志发表《香港已死》为题的封面专题, 但香港回归后的2001年, 《财富》杂志选择香港为第七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 当年策

划《香港已死》的编辑总监Geoffery Colvin, 形容香港是活力(Vitality)之都。“财富论坛”、世贸会议等一系列大型国际会议在香港举行, 经中央政府授权, 香港特区政府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签订了100多个双边协定或协议, 以及适用于特区的200多个多边国际公约; 以“中国香港”名义出席了1300多次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 其中有700多次是限以政府名义参加的会议, 出席了60多次限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 外国驻港领事馆已有100个, 比1997年回归前的93个增加7个。给予港人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00多个, 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对香港特区、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充满信心。

根据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在2006年12月15日至17日的调查, 有51%的人表示满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行情况, 64%同意“一国两制”是对香港有利的安排, 62%同意中央政府有诚意照顾香港的利益, 66%认为香港和内地有很多共同利益, 62%觉得香港人与中央政府有很多共同利益。

2、香港认同祖国的人数大幅度上升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在2006年4月进行的调查显示: 75%的港人表示会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62%表示会以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荣; 65%同意因为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才可以吐气扬眉; 76%同意香港人需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反映了港人对国家、对内地和对中央的态度, 与回归前比较 (下转第21页)

回顾十年前的思考

许锡挥

香港回归十个年头了，如何解读这部“难懂的书”这最新的一页，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看法。此时此刻，引起我思绪万千的，则是回忆及“九七”前夕的许多思考。

当那个历史转折的脚步临近之时，我曾翻箱倒柜，从旧书堆中找到《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老版本，打开已尘封的书页，重新仔细阅读当年马克思有关“文明的英国民族的野蛮性”和“落后的中国民族的愚昧性”的绝妙分析，特别注意他对导致割让香港的鸦片战争结局的“二重性”的深刻论述。^①

经过思考，我从这个“二重性”的论述引伸出“百年香港在中国历史上的矛盾地位”的命题，用史实说明，英国管治下的香港曾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起的正反双重作用。联系到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现实，我在一篇短文中这样说：“能否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今后管治香港的根本指导原则。”^②

关于香港历史地位的“矛盾性”和“二重性”，当然是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但似乎更多的是实践问题。长久以来，香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其双重作用一直在实践中表现着而且被充分利用着。但民国以来，都很少人从理论上给予认

定。记得孙中山说过，他的革命思想“从香港得来”。周恩来也说过：“香港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他们的这个认识，应是基于自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经历。

我主持编写的《香港跨世纪的沧桑（1841-1984）》于1995年出版，对这部书，我不敢说它有多高研究水平，但它确实不仅是同事们和我的学术思考的成果，而且包含了个人亲身经历的生活感受。而该书代序《香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正是作者关于“二重性”问题的集中表述。作者认为，只有科学地认识香港的过去，才能使“一国两制”的构想真正实现。

90年代初期，内地有关香港的各种著作、文章发表不少，其中确有佳作。我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香港学者合编的《20世纪的香港》这本书，较为赞赏。但也发现了一些低劣之作，其低劣之处大都出于“无知”。当时，我曾写了两篇澄清某些历史事实的文章，并在深圳、珠海、香港举行的研讨会上，作了说明。我心想，我不研究澳门，是因为对它没有“感觉”。而敢于研究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② 许锡挥：《历史辩证法与香港回归的现实》，《当代港澳》1997年第2期。

香港,是因为对它有实际的生活感受。要真正了解香港,才有条件研究香港。当年,来自北京的一个声音:“还是你们广东同志对香港问题了解得透彻。”这似乎不是随意之言。我们地处南粤,又具有天然的人缘关系,感受着香港的社会脉搏,自应负起历史责任。于是,引发我曾一度产生了建立一个“南中国港澳研究学派”的梦想。今天回忆起这件事,真是感慨多多!

香港回归前夕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对于我和一起工作的同事是难以忘记的。我们与香港各方人士频繁接触,了解他们的心态。在广泛调查和冷静思考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九七”前后要处理好“十个关系”,要正视社会矛盾的积聚,要充分估计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的冲击,还要小心触动“定时炸弹”和“陷阱”。对此,广东学术界曾展开讨论。大家都认为,应当更多地注意“回归”的精神准备,内地有关人士应加深对“两制”的了解,香港方面则应加强对“一国”的认知,并建议实施“民心回归系统工程”。那时,我们多么希望这些意见能得到重视,并为此尽一分微薄之力。

举世瞩目的日子终于到来。出乎意料的平稳、平静,顺利的政权交接,世人皆称颂。当时有人问:“你为什么说这是出乎意料呢?”我没有作答。

回归之后,我密切注视着香港的动静,俯视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景物,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但我更迫切地关心它的未来。我在内部的《情况通讯》发表了一些议论之时,有人说我“杞人忧天”,可我总感到某些担忧是有依据的,会不会真的“不幸言中”呢?事实自有回答。

面对前些年香港出现的风波,我却又不感到忧虑,反为乐观对待。“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隐藏着各种矛盾,本来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暴露,但它在一瞬间相对集中地提前出现,使这个实践“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样的历史机会是不

容易遇到,有利于我们及早采取对策,也有助于香港人尽快脱出“新格局与旧角色”的困境。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近些年来,香港穿越危机之后,经济好转、民生改善、政局平稳,市民心情向好。我们许多关心着香港的人也为此感到欣慰。但此时此刻,我又另有所思。1996年我曾在香港的杂志上撰文说:“五十年不变是指基本制度,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和变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如果人为地拖延社会改革,可能带来表面和暂时的社会稳定,但必然导致矛盾深化以至日后激化。”^①十年之后,察看今日之香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存在的深层社会矛盾还未能很好解决。许多改革都举步维艰。我担心的是,在“和谐”、“稳定”、“复苏”的现象掩盖之下,某些重大矛盾和问题被忽视以至拖延其解决。此乃非幸事也。“你又杞人忧天了!”没错,我深信《塞翁失马》中祸福相互倚伏的道理。

“九七”之前,我曾预言,“一国两制”的实践必定会将理论抛在后面,到时这个理论要注入新的内容。十年实践,虽不算长,也不算短了,似乎应当作一些历史性的理论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引新的实践。

我辈老矣,热切期望年青有为的后来人,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在香港问题的探索中有更多建树。也希望香港在下一个十年的途程里,穿越被边缘化的险滩,再谱出“不朽香江名句”。

(责任编辑:袁持平)

^① 许锡挥:《化解香港人的九七情结》,香港《亚洲周刊》1996年7月7日。

繁荣发展人心聚，再领风骚向未来^①

我看香港回归十周年

周运源

稳定和繁荣发展的十年

香港稳定和繁荣发展的十年，使我们不能不追溯到1997年7月1日，在那举世瞩目的特殊日子，香港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也就是从那时起，香港获得了特殊意义的新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截止2006年年底，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数达到360家，市值达到60170亿港元，占总市值的48%。而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银行有四分之三在香港营业，香港的股票市场按市值计算在亚洲地区排名第二。仅2006年1至11月，内地实际使用香港资本对比上年同期增长14.1%。与此同时，香港仍然是内地出口国际市场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商品顺差来源地。据2006年1至9月份的统计，内地在香港设立的中资企业的数量达到174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资料看出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据《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2007年1月16日共同发布的“2007年

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认为香港居民连续13年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环境中。

香港回归祖国10年来取得的绩效，连英国驻香港总领事柏圣文也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肯定：“香港回归10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经济繁荣、股市兴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这清楚地表明香港回归后取得的巨大成功。”

主权回归后人心聚合的十年

1997年7月1日，当五星红旗飘扬在香港时，举世瞩目，万众欢腾，经历百年沧桑的香港，一洗国耻终于回到祖国母亲怀抱。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使香港在20世纪之末重新获得了新生，迈上持续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

处于世纪之交的香港，在回归初期无论是人们的思想理念，还是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洗牌，伴随着主权回归后的重要工程是港人的人心回归问题，笔

^① 本文是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我看香港回归十周年”应征论文，在海内外6000多篇征文中荣获二等奖。详见信息动态内容

者当年在庆香港回归的文章中曾与其他学者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尽管当时有的港人对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心存疑虑,或作观望,或存侥幸心态“拭目以待”,有的甚至移居海外。然而,真金不怕火炼,香港回归祖国后通过全面落实“一国两制”,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实而有信,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相关政策,全力支持香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的可持续发展,使港人对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的政治、法律制度、民主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充满信心。据香港大学近年来所做的民意调查资料显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港人爱香港爱祖国的信心日益增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也认为,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这与国家在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体育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香港人感到自豪。由此可见,在今天的香港,人心聚合、爱祖国爱香港已经蔚然成风。在今天的香港,人心聚合的另一个证明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日益受到越来越多港人的青睐,申请者日益增多。据有关资料,截止2006年4月底,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享有免签证入境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136个。

香港回归十年 港人“凤还巢”踊跃

众所周知,香港回归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内地各省(区)对香港的发展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禽流感的爆发,还是SARS(沙士)等对香港的民生、经济、社会和政治所造成的重大影响,都得到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为着保障港人的

民生和经济、社会等的稳定繁荣发展,中央政府于2004年初以来,陆续推出了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分阶段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香港的民生,经济和社会等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作用。香港回归以来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给全面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移居海外的香港人返回香港发展提供有利的机遇和条件,特别使原先那些移居海外发展的香港人看到了希望所在,陆续回流香港,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包括移居海外并且在当地创造了自己事业成就的港人,也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看好自己回来香港发展事业的广阔前景,纷纷返回香港再创事业。这种情况被人们称为有香港特色的“凤还巢”。

人心信心民族魂,繁荣稳定发展

如果说,香港回归自1997年7月1日由开始的主权回归,逐步过渡到人心回归,是政制发展史上的系统工程,那么,其中港人的人心回归则无疑是根本上的重要问题。事实上,香港回归十年来。无论是港人对国家认同感指数的逐步回升,还是在具体层面上香港每天新闻节目开播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播放,对国旗、普通话、解放军驻港、万里长城、维港夜景等使港人引为自豪方面,都日益显示出港人爱香港、爱祖国的言行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这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魂的凝聚力之所在。在今后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一体化发展的态势下,随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香港基本法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日臻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在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决,包括香港政府顺民意施政,社会民主的渐进式发展,政制改革中有竞争的选举制度的完善,以及香港经济转型的逐步实现,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一国两制”的全面贯彻落实,必将为香港继续保持和发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等多个国际中心的作用提供重要的保证,必将为香港带来前景更加广阔和美好的明天。

“香港之死”预言破产, 活力之都誉满全球

人们或许还能记起,在香港回归前某颇有影响的新闻媒体曾经预言“香港之死”,由此一度引发了十分有害的舆论导向。然而,香港回归初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全体港人,沉着应战“亚洲金融危机”,保持了香港的稳定发展。仅仅经过4年多的努力,2000年香港实现高达10.5%的经济增长幅度,同时期香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总量超过了回归前的水平,以至于打破当年的预言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当年那家新闻媒体始作俑者,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以活力之都来评介香港的新发展。人们同样看到,香港回归十年来经济、社会和民生等得到稳定的发展,特别是2006年香港的人均GDP达到21.035万港元,创历史新高,并日益凸现出香港整体良好的发展态势。

香港回归十年 实践“一国两制”凸现生命力

我们知道,“一国两制”方针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国策。在香港实

施“一国两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妥善处理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政治社会制度共存和谐发展的尝试。香港回归十年来,“一国两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所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已经向世界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某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与整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共存和谐发展,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 International 竞争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后随着香港政制改革的完善和发展,香港特区政府顺应民意施政以及香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完善,香港整体经济转型的逐步深入,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发展蓝图中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将更为凸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在不断完善中将更加深入人心,并必将在世界政制发展史的实践中,取得不可估量的特殊性贡献。

(责任编辑:黎熙元)

“变”与“不变”：

香港回归十年回顾展望

黎熙元

19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针对港、澳、台主权和治权的处理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框架。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谈及港澳回归问题时对这一政策框架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1984年6月22、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中说：“我们多次讲过，我们政府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①其后邓小平又说：“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国以后50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所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还要说，就是50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②这样，中国政府对港澳台的政策就被社会舆论简化为两句容易记忆的话“‘一国两制，’50年不变”。不久，结合香港当时的社会状况，邓小平关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更被世俗化（或口语化）地演绎为“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对香港而言，“一国两制”政策的核心思想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内地实行的政治、

经济、社会、法律等现行制度不会在回归后推行至香港；二是回归前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在回归后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三是回归前香港法律当中含有英殖民地色彩的、抵触《基本法》、或由于实际情况变化已不再适用的法律应该删除或修改。由是观之，“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只是形象地、因而也只是局部地描述出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政策思想，其内涵比“一国两制”狭窄得多。但是“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对香港人来说简单、易懂易记，因此被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在回归前后甚至变成一种特别的表达句式，市井坊间常听见例如“茶照饮”、“主照信”之类的语法同构词句。

《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香港特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宣布为同《基本法》抵触者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6页

②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12页。

外,全部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1997年2月,人大常委会按照《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除了24条被认为全部或部分条文抵触《基本法》的条例外,通通沿用香港所有原有法律。换言之,普通法的原则和香港原有的600多条条例差不多全部继续适用于香港特区,其中包括绝对受法院管辖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基本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设立终审法院和委任终审法院法官方面非常成功。终审法院的常任法官见多识广、公正无私、独立自主;而非常任法官(其中一位更每宗案件都审理)都享誉国际,除李启新、贺辅治和苗礼治三位勋爵来自英格兰上议院大法官外,也有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退休首席法官。前特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在2001年3月牛津大学亚太同学会致词中强调香港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在回归之后并未改变,同时也保留了高度的独立性;她引述英国官方声明:“香港的各种基本自由维持不变,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决心确保‘一国两制’取得成功。”

自回归以来,香港人已经成功地选出两届立法会和区议会,2004年立法会选举选民投票率比2000年上升约12%,显示出香港市民对政治和特区事务的参与热情提高。香港舆论自回归以来对全国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香港终审法院判决与全国人大的关系、何谓爱国爱港、特区政府的公屋政策、税制、官员问责制等等重大政治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辩论。充分体现了在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下香港原有的社会制度也得以保持并运作良好。

2007年3月,香港进行了第一次特首选举,两位候选人曾荫权和梁家杰为此进行了3个月的竞选活动。英国《泰晤士报》网站4月13日文章(杰拉德·贝尔:“一个国家,一个担忧”)曾这样报道:“这是中国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两个男人参加了

两场美国式的电视辩论。不仅近一半的香港成年人观看了辩论,内地那边也有许多人观看了辩论。在香港,言论自由似乎没有被剥夺。移民、污染、经济发展等问题促使大家更关注政治”。

在香港报刊的评论中,回归并没有使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投机心态依然如故,跑马、彩票、股市一直如火如荼吸引大量市民,即使在金融风暴之后遭受重创的楼市,不少市民也依然愿意收拾心情重整投资策略。香港人爱吃,一年一度由生产商举行的美食博览会、由旅游发展局举行的香港美食节都热闹非凡,茶楼食肆长年兴旺。由是观之,“马照跑,股照炒”当无疑问,而香港人是不是特别爱跳舞就不得而知,联想香港的流行文化和影、视、歌、印刷等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把“舞照跳”理解为“歌舞升平”可能更加贴切。

一、“变”化的社会

经济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三不变”并不意味着香港在回归之后一直原地踏步,相反,无论是本地人或外来人,都很容易感受到十年来香港的变化发展。1997年末香港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其后5年本地经济泡沫破灭、世界商品市场不景使香港经济陷入萧条。面对困境香港政府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发展。2003年CEPA与“港澳自由行”开始实施,参加“自由行”的内地游客带来可观的消费,香港企业在内地发展拥有更大自由、更少制度和资本的限制,香港经济迅速复苏,2005、2006年GDP的增长率都高于7%。为了提升本地产业水平,自2000年起香港各界投资于研究发展的资金和人力逐步增加,四年间两项指标分别增长153%和192%。

发展与变化不仅发生于经济领域,也发生于政治和社会领域。2002年香港政府实施政府高级官员问责制,通过高级官员的政治任命方式来提

香港研究及发展投入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研究及发展开支(百万港元)	6 218.4	7 543.6	9,505.2
研究及发展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百分比	0.47	0.59	0.74
研究及发展人员数目(相当于全日制)	9 802	12 890	18 846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和官员的责任心。2003年香港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禽流感 and SARS 相继袭击香港，对公共卫生、公众健康和公众信心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但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医护人员表现出高度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香港公众和病人家属也表现充分合作和理解，香港得以度过危机。而香港对重大传染病的控制和通报方式，已成为很多其它城市对抗传染病全球扩散的重要参考模式，前卫生福利司长陈冯富珍也因此当选新一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基本法》是香港回归后实施的“小宪法”，规定了香港独特的限制安排。根据前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2005年在香港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的发言资料，《基本法》共有一百六十条条文，过去七年半，香港法院曾对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条文作出解释。这些案件的判词不仅就涉及的个别争议作出裁决，也产生了一套判例，加深大众对《基本法》的了解。《基本法》的多个重要范畴现已获得澄清，包括居港权、普通法的延续性、表达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财产权益的保障和公务人员的权利。梁爱诗认为每宗涉及解释《基本法》的案件审结以后，港人对《基本法》涵义的了解随之而加深。回归以来，社会各界人士协力同心，让新的宪制秩序在香港牢牢植根。香港的法治精神毋庸置疑，司法独立稳固如昔，人权在本地、宪制及国际三个层面都受到保障，法律制度蓬勃发展，同时，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维持不变。她相信，透过各界人士努力和合作，“一国两制”会继续为全世界带来启示。

伴随中国的整体发展，回归后香港的国际地

位不断提高，主办的国际盛事越来越多。2002年4月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地区副主席的身份主办世界海关会议，为期4天的第九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地区海关首脑会议9日起在香港举行。地区内26个成员组织当中，共有23个组织派代表团出席这次高层会议。区内成员在会上就相互合作之事宜交换意见，并详细讨论与世界海关组织相关的多个议题，例如打击私烟措施及如何加强海关行政互助等；与会者还将研究如何加强海关措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2005年12月，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这次会议，不仅证明了本港具有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能力，向外界展示本港的会展业实力；同时，还有助于对外展现香港自由开放的国际形象，为香港的未来发展积累丰厚的无形资产。对提升香港作为亚洲区内国际顶级都会城市的形象和地位，对突显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2006年香港主办国际电讯展，这是自1971年以来，世界电信展首次在日内瓦以外的地方举行。世界电信展汇聚了世界各地公、私营机构的业界精英和专家，也吸引国家元首、部长、监管机构主管人员和跨国公司的行政总裁。据唐英年估计，这项盛事吸引数万名海外游客，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收益。香港过去曾主办两项国际电信联盟的区域项目，分别是2000年及2002年的亚洲电信展。在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香港成功主办2006年国际演艺协会国际会议，加强了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形象，并且提升香港在国际艺术文化领域上的地位，促进香港成为文化交流的中枢。

纵观香港回归十年，不变的制度内在于变化的社会形势，反过来变化的社会形势也或多或少地、无声地推动制度转变。“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所代表的“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和中央政府在1980年代初针对当时许多香港人害怕回归之后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香港的社会制度和生存环境会发生变化的心态而做出的承诺，也是中央处理与香港关系的基本策略。在“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框架下，中央政府的“不变”策略贯彻起来毫不困难，十年来中央政府确实贯彻了这一策略，因此在香港近几年的民意调查中，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评分总是高于对本地政府的评分。

二、“变”与“不变”的迷思

有趣的是，“变”与“不变”反而变成了香港人的“迷思”（myth），十年间围绕“变”与“不变”争论不休。最早的争论发生在1998-2000年关于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废存。联汇制自1983年实施以来国际市场评价很高，币值稳定曾被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联汇制在1997年却成为港元遭受金融投机者攻击的动因，而香港本地产业则要花多年时间来消化捍卫港元汇率所付出的（币值、利率偏高）代价。去年联汇制废存辩论再起，原因有多方面。维持港元汇率必须跟随美国的利率政策，使香港失去自主调控经济的利率杠杆。回归以来，当年导致港元汇率波动的政治经济因素都不再存在；而且香港经济越来越与内地经济融为一体，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路透社专栏文章（2006年5月23日）指出：“2004年，港元与美元利率走势第一次背道而驰。美国连连升息后，香港货币市场的存贷款利率不但没有上浮，反而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大量资金涌入香港，期待人民币升值，使得银行体系资金猛然上升，利率下降。”为此香港

特首曾荫权提出，待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之后，港币汇率可能最终与人民币挂钩。但是，联汇制毕竟是回归前香港具标志性的经济制度之一，正如不少香港学者指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今后香港的发展是否继续需要这样一种“紧跟美国”的象征，是联汇制废存争论的要点所在。

第二个重要争论围绕香港政府一贯推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否应该继续贯彻，低税制是否应该继续维持。“不干预”政策包括低税制和政府不干预市场，是港英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在1950-1980年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被奉为“不干预主义”，也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经济体的指标之一。“不干预主义”得以长期维持，主要原因在于港英管治时期政府的公共福利和对经济部门的开支较小；低税制所导致的财政收入不足由土地批租所得的租金来弥补。这种政策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业已成为香港经营高成本的主要原因。同时，香港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呈现出科技研究和开发能力弱、技术产品生产发展动力不足以及社会贫富两极化严重的缺陷。税基狭窄影响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进而影响公共福利的投入和对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度。诸多回归前已累积下来的经济结构性弊端在“不干预”的政策框架下不能得到及时矫正，继续成为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当董、曾两位特首试图作出干预房地产市场、开征新税、增加对科技研发的资助时，却受到不少舆论质疑和批评。

第三个重要争论围绕特首选举的方式能不能在2007年改为普选。且不谈政治人和政团之间的权力竞争，就以香港民间对这一辩论的态度来看，支持2007年就改制为普选的呼声在2003-2004年香港经济萧条期间最高；2005年之后经济复苏，普选的争论就只多闻于政团和政客互相攻击的场合。其变化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香港人认识到，要保持高效政府运作、达到政通人和，不是单靠改选特首一个人就能够做到的，对整个政制、政府设

计和施政观念也需要做出全面的检讨和改革。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和权威性需要不断提高才有利于管治,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但是认受性和权威性的提高是取决于特首由普选方式产生、还是取决于特区政府的整体施政效果,香港舆论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反而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而香港公众对普选的态度变化与经常在传媒亮相的政治人似乎也有所不同。

上面三个最重要的辩论主题都涉及到香港回归前的制度设置。1980年代基于“不变”的策略这些制度在香港《基本法》中肯定地予以保留,并对修改的可能方式也做出了一些最基本规定。在“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的“不变”表象背后,更需要重视和反思的是原有制度的“变”与“不变”。当然,每一个制度的变化都意味着原有权力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从中央政府的策略框架来看,“变”与“不变”是香港人自

己的选择。从香港本地来看,“变”与“不变”混合了很多对过去岁月的情结、对当前利益变化的即时反应以及对未来的疑惑。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炳良在《紫荆》杂志(2006年11月号)中撰文认为香港人“贪恋前朝”,同时对回归后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缺乏深层宏观的前瞻性思考。其批评可谓切中要害。进一步说,在香港本地各界对问题仍然争论不休、未能达成共识的时候把问题上交中央裁决,之后又批评中央干预地方,其实是在潜意识中沿袭了殖民统治下官民关系的思维方式。从本质来看,香港回归最根本之“变”就是:从今以后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来筹划,香港人要学习做一回哲学家,而不是只顾低头点算眼前利益的小商人。

(责任编辑:袁持平)

(上接第11页)

已是天壤之别,显示越来越多港人“人心回归”。

3、政治形势保持稳定

国际社会与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的大幅度提高以及认同祖国人数的上升,为香港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回归后,不仅移民潮完全退潮,且出现移民回流香港热潮,且港人关注点也从过去的担心“一国两制”不能落实转向关心经济,因此,回归后尤其是回归初期香港政治很平静。

虽然2003年因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而引发七一游行,且之后又出现系列政治争拗,尤其是政制改革争拗,这些在香港社会的确造成一定影响,但是香港社会的游行示威始终保持和平有序地进行,社会各种争拗基本保持理性。加上行政长官曾荫权大力推动共识政治,让社会各方面能够与政府一起探讨政改课题,这些都有助于政治稳定。

五、结 论

综上所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特区政府运作顺畅,民主制度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不断发展,港人民主意识不断提高,政治保持稳定,这些表明香港“一国两制”最初10年政治上的实践,基本顺利和成功。

参考文献:

- 1、香港特区政府选举管理委员会网页。
- 2、香港特区立法会网页。

(责任编辑:袁持平)

大香港主义和“边缘化”危机

郑佩玉

回归祖国以来,香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先后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边缘化”危机感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港人、特别是某些高级官员在看待、处理与内地关系时,总是抱着一种大香港主义的心态,近年出现香港被“边缘化”的讨论,不能不说是对此种心态的冲击,甚至是洗刷。“边缘化”危机感的出现,有助于港人以积极的态度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种种优势,推进香港的稳定繁荣发展。

一、香港具有避免“边缘化”的条件

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经济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发展优势,而且新优势也在成长,传统优势与新优势的结合对香港来说如虎添翼。

1、回归十年来,中央政府始终恪守《基本法》,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制度,保障港人的自由权利,为香港稳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对此,港人的“恐共心态”逐渐消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逐渐加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逐渐提高。

2、回归以来法制健全,政府廉洁、资金进出自由,税制简单、税率低,这些传统的良好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加上“背靠内地”的优势,使香港仍然成为世界上外国资本最具吸引的地方。

3、国际化是香港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命线,香港是闻名于世的国际商业服务中心,集国际金融中心、对外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和国际旅游中心为一体,长期积聚起来的种种服务优势,受到《基本法》的保护。这使香港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4、香港不仅拥有经济国际化的种种优势,回归以后还拥有“背靠内地”的强大优势,中国正在实施“十一五”规划,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CEPA的实施使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逐步开展。这一切都有利于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桥梁的作用,有利于香港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长远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经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

由于上述的多种有利因素,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特区政府努力下,香港终于战胜了金

融危机的冲击,2003年走出周期性低谷以后经济发展加快。金融危机一方面给香港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以其破坏力,强制性地对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为新一轮的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2004年经济实质增长了8.6%,2005年7.5%,2006年6.9%。人均GDP也分别以7.7%、7.1%和6.2%的速度增长。其间得益于全球经济转暖与CEPA的实施。

二、“背靠内地”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

①保持着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2004年香港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第11位,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16.4%,在此基础上2005年继续增长10.9%,2006年增长10.5%,贸易总额为50608.31亿港元。2004—2006年间香港转口贸易分别增长16.8%、11.7%和10.0%,这是国际市场好转和香港与内地对外贸易合作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内地是香港转口货物最大来源地,通过香港转口至北美、欧盟和亚洲的货物占转口贸易的6成以上。据贸发局2004年6—9月的调查,90%的受访港商货源来自内地,前3年是86%,港商在内地大量设厂和采购,目的是节约成本,扩大生产。可见,两地经贸合作有利于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

②离岸贸易中心的地位日益提高。

随着内地港口的发展,港商还在内地采用直接付运或转运的方式,将货物运至欧美市场,使离岸贸易迅速增长。从数据来看,从2001年起离岸贸易活动收益已超过运输收益,约占香港整体服务输出的1/3,跃居服务输出的首位。2003年这项收益达1,290亿港元,相当于当年转口贸易的79.6%。2004年贸发局在6—9月的调查表明,离岸贸易占受访公司50%的货物,1997年是34%,2000年为39%。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转口贸易并没有因离岸贸易的增长而减少。调查还表明83%的受访公司是在香港安排贸易经营,68%和65%在港安

排有关保险和仲裁事宜,可见离岸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香港支援服务的发展,强化了香港作为国际商贸枢纽的地位。

③服务输出持续增长位居世界前列。

多年来香港服务输出居世界第10或11位,2004年排11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当年增长17.9%,2005和2006年分别增长11.3%和8.9%。服务输入分别增长14.6%、7.4%和6.4%(以2000年价计)。2006年金融服务输出增长最为突出,增幅达40.7%,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绝对值居首位,为1817.60亿港元,运输服务输出从2004年大幅增长24.2%以后下降至2006年的9.5%,但其绝对值仍居第2位,为1730.74亿港元。从服务输出的目的地来看,中国居首位,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2001-2005年间从24.9%上升至26.3%,美国居第2位,除欧盟和东亚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约占30%左右。以上说明服务输出的目的地分布十分广泛,服务项目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④巩固了国际航运、空运中心的地位。

1992年起香港11次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2003年集装箱吞吐量再创新高,2004年被新加坡超过退居第二位,近几年由于集装箱吞吐量仅有2%左右的增幅,上海港和深圳港却获得双位数的增长,其世界排名有可能很快被这两个港口超过。面对邻近地区的激烈竞争香港货柜港何去何从,需要做出选择。香港机场以国际乘客量和国际货物处理量计算,仍然是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近年通过机场以高费用运送高价值或需按时到达的货物逐渐增多,以货值计算1995年占20%,2005年已增至34%(郭国全)。未来航运的中心地位是否被空运取代,还要看今后的发展。

⑤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提高。

香港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内地的主要集资中心。银行业是金融体系的支柱,以对外银行交易量计算,香港是世界第15大银行

中心,以成交额计算香港是世界第6大外汇交易市场。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市场交投活跃,至2006年7月止,以市值计算香港是世界第8大股市。若以新股上市集资额计,在2005年和2006年首7个月香港的集资能力居全球第3位。2004年加上公司上市后再集资的金额,香港股市集资达2709亿港元,仅次于纽约、西班牙,其中,上市集资额为930亿元,内地企业占78%,为728亿元,这表明集资主体是市值较大的中国企业,香港作为中国企业集资中心的作用十分明显。

香港是国际资金流动快速的地方,2003年扭转了对外金融资产和债务负增长以后,各年都有理想的增长,2002—2005年间年均增长13.2%和15.2%,2005年已分别达116565.31亿港元和81746.80亿港元,国际投资头寸净值年均增长9.2%,2005年达34818.51亿港元。这表明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十分活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⑥香港是外来投资与对外投资活跃的地方。

香港是亚洲外来直接投资的热点,仅次于中国内地,居第2位,2004年外来投资2651亿港元,比2003年增长了150%,2006年为3332亿港元,比上年增长27.4%,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CEPA的实施有助于香港吸引外来投资,据调查,两成在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外国公司表示是因CEPA而来港。近几年海外公司驻港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不断增加。2003年分别是966家和2241家,2006年6月1日又分别增至1228家和2617家。

香港不仅是吸引外资,同时也是对外投资十分活跃的地方。随着经济的好转,向外投资大幅增长,2004年增长率为730.1%,2005年与外来投资都有所下降以后,2006年增长了57.8%。在香港以外成立为法团的公司也不断增加,2005年为7488家,比上年增长60%。这些公司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除英属维尔京群岛有2754家以外,排前5位的还有美国、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英国和日本。

以上说明,随着香港经济的好转,以及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发展,香港作为国际商务服务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发展,传统的中介服务中心正在向现代中介服务中心转变,而作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亦日益加强,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十分明显。

三、防范“边缘化”的对策

自香港回归后遭遇金融危机重创以来,特区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复苏,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这应是提高竞争力,防范香港“边缘化”的根本对策,但是步履艰难,进程缓慢。笔者几年前曾在《“九七”后香港经济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香港是次经济结构转型比过去几次转型会困难得多,因为知识、人才要素的形成要比传统要素取得的难度更大,加上人们对是次转型思想准备不足,这就要求各界人士不分行业、不分界别,不论从属任何政治团体,都要理性地把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摆在一切行动的首位。可是几年来争拗不断,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香港失去了几年的发展时间。香港存在被“边缘化”危机的提出,就像清醒剂促使人们要认清形势,不失时机地以切实可行的对策,推动经济发展。笔者认为目前宜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①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知识化的发展以及CEPA的实施,要求人们以新思维、新制度、新政策以及新的模式来与之相适应。但目前不少人仍基本固守在传统的禁锢之中,把经济的繁荣发展寄希望于房地产价格和股市的飙升,关注于赚快钱。因此,政府和各类机构,包括传媒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促进人们思维方式(包括大香港主义)的转变,使人们客观地面对新形势,面对内地区域经济,尤其是华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以务实的态度鼓励人们提高创业技能,继续发扬

艰苦创业的精神。

②要充分估计回归后形成的新优势与传统优势结合所产生的能量。回归十年里所形成的新优势,主要是源于“一国两制”。回归十年来中央政府在香发生金融危机、沙士病毒横行、经济恢复和转型乏力等重大关头,都推出了重大的政策措施帮助香港度过难关。人们对十年来“一国两制”实施的信心有了提高,然而一些人只谈“两制”,忽视、甚至无视“一国”,对“一国两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甚了了,即使传媒有所提及,也极其有限,甚至负面的多于正面,对中央的香港政策知之不多,人云亦云,常常被人误导,对中国国情也缺乏认识。前布政司现任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会长钟逸杰曾指出,“很多公务员对中国也没有好奇心。”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港人对香港的发展前景模糊不清,甚至迷失方向。不清楚香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浪潮中,如何发挥“背靠内地”以及“一国两制”的优势,提高香港经济国际化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③在新的形势下,特区政府需要重新审视自由经济制度下政府的地位、作用和政策。钟逸杰曾指出,“政府高地价政策使一些项目无法实现”,他希望官员要正视问题,改变态度和思维,认真探讨香港面对的经济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路向。最近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的问题不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是不断的争拗。这些问题都需要港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去明辨,并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实施相宜的方针,促进问题的解决。

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CEPA的实施,服务业境外迁移的步伐必将加快,香港如何吸取制造业北移的经验和教训,填补服务业外移所留下的发展空间,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

⑤CEPA实施以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的认识还需要时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需要认真对待、及时解决,

如内地营运环境复杂,地方保护的存在,尤其是两地市场模式差异较大,政府的体制和运作模式也不同,往往由于没有指引或指引不足等等,使人们感到困惑、无所适从,给北上创业的港人带来一定的困难或误解。两地政府应积极推进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认识统一到CEPA的协议上来,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努力探索落实CEPA的途径、模式及机制。

⑥两地政府继续大力鼓励、扶持香港与内地科技界、企业界积极开展科技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认真解决妨碍两地科技合作的障碍,共同促进两地高技术、高增值产业的发展,并建立一个适应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更为开放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尽快缓解科技人才不足的矛盾。

参考文献:

- 1.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各年施政报告
- 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8-2005年的《香港》
- 3.港澳经济年鉴社,2001-2006年各年《港澳经济年鉴》
- 4.施汉荣,《一国两制 历史迹——港澳和平回归与经济社会论文集》,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版。

注:文中有关香港的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责任编辑:袁持平)

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经贸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袁持平 田甜 尹丽丽

一、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经贸合作分析

1. 贸易方面

(1) 商品贸易

香港回归十年来,世界经贸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都促使内地与香港两地的商业及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内地作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的重要性

也日益增强。

1997年,香港与内地贸易为1431亿美元,占香港外贸的36%。十年之间,两地贸易大幅增加一倍,达至2006年的3012亿美元,占香港对外贸易的46%。在陆路跨境车流和人流方面,2006年共处理了1500万架次的跨境车辆及1.5亿万名旅客。其中,车辆较1997年大幅增加60%,人流增加了130%^①。香港回归十年间与内地贸易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1 香港回归以来与中国内地的贸易状况

单位:亿港元

年份	进口	港产品出口	转口
1997	6083.71	638.67	4438.78
1998	5806.13	560.66	4073.66
1999	6075.46	504.14	3991.88
2000	7149.87	541.58	4888.23
2001	6819.80	495.47	4965.74
2002	7170.74	413.74	5718.70
2003	7856.25	367.57	7057.87
2004	9182.75	378.98	8506.45
2005	10493.35	446.43	9679.23
2006	11930.00	403.00	1115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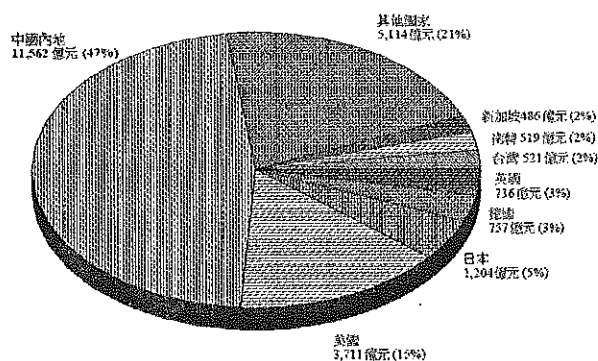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1997-2004年数据来自1998、2004、2005年《港澳经济年鉴》;

2005、2006年数据来自《香港统计数字一览2007》,香港政府统计处

① 《香港海关关长:香港与内地贸易十年间增长一倍》, <http://business.sohu.com/20070512/n249977227.shtml>, 2007年05月12日

内地市场是香港出口的重要增长动力,在香港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输往内地的出口占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差不多一半(见图1),较20世纪90年代初少于30%的份额高出许多。扣除外发加工贸易后,输往内地的出口在香港整体货物出口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于2006年达20%,比重大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由于香港与内地经济日渐融合,加上内地因中国加入WTO而增加出口货量和加快贸易开放步伐,其内部需求又蓬勃增长,以致香港输往内地的出口于2001-2006年间有显著的增长,每年平均升幅达17.4%(见图2)。

图1 内地在香港的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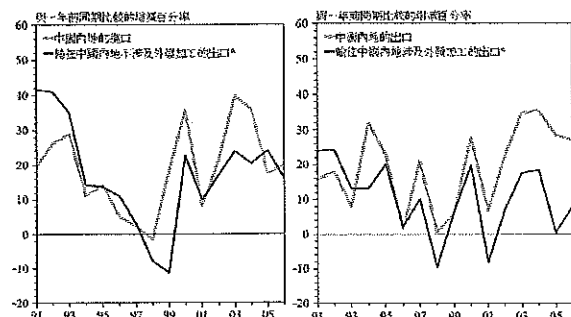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06年经济概况及2007年展望》,

商务部港澳台司, <http://tga.mofcom.gov.cn>

图2 香港对内地出口贸易发展趋势

输往内地供内地使用的出口显著急升,输往内地作外发加工的出口特别是中国2001年入世之后与内地出口表现关系密切



注:2006年数据为第一到三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2006年经济概况及2007年展望》,

商务部港澳台司, <http://tga.mofcom.gov.cn>

香港转口贸易中又有很大比重(91%)与内地有关,而内地同时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最大市场和最大来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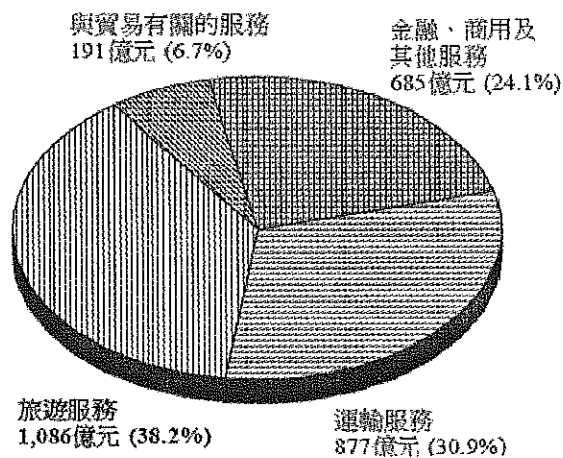
(2) 服务贸易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模式由转口向离岸贸易转移。香港回归十年来与内地服务贸易情况如下表2所示。由表中数据可见,回归以来香港对内地服务输出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服务输入基本保持平稳。

反映香港作为贸易枢纽的重要角色,2006年与贸易有关的服务和运输服务占整体服务输出约3/5。服务输出在过去数年一直维持强劲的增长势头,2006年继续以活跃的速度增长,幅度为8.7%。与贸易有关的服务输出(主要包括离岸贸易),因受内地贸易往来密切所带动,在2006年增长10.8%。

而近年来,随着内地“自由行”旅游项目的开展,大量内地旅客涌入香港。香港的旅游服务输入成为服务输入的最大组成部分,2006年旅游服务输入占香港整体服务输入的38.2%(见下图3)。“自由行”实施以来,在访港旅客之中,内地旅客的比重都在50%以上,2003年由于非典影响,内地访港旅客略少,但比重依然在54.5%(见下表3)。

图3 旅游服务是服务输入的最大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2006年经济概况及2007年展望》,

商务部港澳台司, <http://tga.mofcom.gov.cn>

表2 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的服务输出/输入

单位: 百万港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输出	65067	63658	68844	76479	94547	102281	116787	127947	——
输入	61887	62188	59386	59637	60876	58080	65960	71189	——

注: 2006年未有按地区划分服务贸易输入/输出数据

资料来源: 1998-2003年数据来自2002、2005年《港澳经济年鉴》;

2004-2005年数据来自香港政府统计处

表3 “自由行”以来内地每年访港人数

单位: 千人次

	2003	2004	2005	2006
内地访港人数	8467	12246	12541	13591
访港总人数	15535	21811	23359	25251

数据来源: 2003年数据来自《2003-2005年中国出境旅游的现状分析与趋势预测》, 中国网, www.china.com;

2004-2006年数据来自《香港统计数字一览2006、2007》, 香港政府统计处

2. 投资方面

1997年香港回归后, 对中国内地与香港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中国加入WTO和CEPA的签订与实施。

随着香港的回归, 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 这不单对内地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有正面作用, 同时对香港的经济也有很大支持。CEPA为港资对大陆投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CEPA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下和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做出的特殊安排, 会导致港资对内地的投资会有新的机遇及动向。

I. 港资流向

CEPA后港资流向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区为主, 对西部的投资也将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仍是港投资的重中之重。香港与长三角的经贸合作近来也大有持续快速升温的态势。

II. 港资规模类型

CEPA后港资流入内地的规模类型仍以中小企业为主。目前香港约有30万家企业, 中小企业占98%以上, 中小型企业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CEPA为服务业中的17个行业进入内地降低了门槛, 放宽了限制, 实际上就是为中小型资本进入内地开绿灯。^①

III. 总体发展规模走向

CEPA后港资流入内地的总体规模将稳步扩大流入速度加快。而且港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资本为主力。由于放宽限制, 对香港近年发展不景气的服务业很有利。香港的管理咨询、会展服务、广告、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物流、旅游服务、法律服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第三产业将持续进入内地。

(1) 香港对内地的投资

香港为内地吸收境外投资的最大来源地, 截至2006年5月底, 内地吸收香港直接投资累计25.95万个项目, 合同外资金额累计5,517.80亿美元, 实际使用金额累计2,663.96亿美元, 占全国累计总数比重分别为45.63%、40.81%和41.28%。^②

香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 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 截至2005年年底, 中国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为365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4%。到2006年12月, 大约有360家内地企业成功来香港上市, 筹集资金累计超过13000亿港元。内地企业(红筹股、H股)已占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约40%, 占香

① 《CEPA为港资对大陆投资带来的机遇和前景》, 2005年4月20日, <http://www.jctrans.com>

② 《香港之最》, 中联办经济部贸易处, 2007年1月21日

表4 回归后香港对内地投资^①

金额单位: 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实际使用港资金额		
	个数	同比%	占比%	金额	同比%	占比%
1997	8405	-19.2	40.02	206.3	-1	45.59
1998	7805	-7.2	39.42	185.0	-10.3	40.71
1999	5902	-24.4	34.89	163.6	-12.6	40.58
2000	7199	22	32.21	155	-6.3	38.07
2001	8008	11.2	30.64	167.1	167.1	35.66
2002	10845	35.4	31.74	178.6	6.88	33.86
2003	13633	25.7	33.19	177.0	-0.9	33.08
2004	14719	7.97	33.71	189.9	7.29	31.08
2005	14831	0.76	33.71	179.5	5.48	24.72
2006	15496	4.5	37.36	202.3	12.7	32.11

注: 占比%系指香港对内地投资占内地利用外资总额之比重。

资料来源: 商务部

港股票市场成交额超过50%。^①

香港是内地企业对外投资数量最多的地区。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3月,内地在香港投资的企业数量为2,557家,投资额70.9亿美元,居内地对外投资之首。^②

二、香港与内地经贸发展趋势

(一) 香港回归十年来与中国内地经贸关系日益密切

由以上分析可见,香港回归十年来,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明显加深。2001年中国加入WTO及2004起CEPA各阶段的实施,无不为香港的经济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CEPA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下和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做出的特殊安排,会导致港资对内地的投资会有新的机遇及动向。近几年,香港积极参与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经贸合作,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以上述区域为腹地加快了自身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内地经济在各方面的紧密融合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 商品贸易方面

香港从内地进口以及输往内地的整体出口数额逐年攀升,截至2006年,香港与内地贸易占香

港外贸的比重已达46%,中国内地已成为并将继续保持香港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同时,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力量,在中国内地与国外,特别是与欧美日贸易中充当重要转口港的角色。香港转口贸易中有90%以上与内地有关,内地已经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最大市场和最大来源地。

2. 服务贸易方面

之前已经提到,旅游服务输入已成为香港服务输入的主要部分,为这方面的增长起到巨大带动作用的就是内地“港澳自由行”的实施。根据前表4,2003年开始“自由行”后,内地访港旅客出现大幅度增长。到2006年,内地访港旅客占整体访港旅客的百分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上。旅游业的发展、访港旅客的持续增加是香港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3. 投资方面

2005年底香港外来直接投资存量较上年升15.2%,达40563亿港元,其中中国内地占其中最大比例,达31.4%。统计处表示,外来直接投资存量增加,是由于外地企业在香港有联系公司的市值上升,以及流入这些香港有联系公司的直接投

^① 《香港:内地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重要平台》,2006年12月30日, <http://www.chuguo.cn>

^② 《香港之最》,中联办经济部贸易处,2007年1月21日

资增加。内地在其中占最大比重,反映了内地投资对香港的重要性。

2006年1至6月,内地企业占香港投资推广署已完成的投资推广项目的13.5%,显示内地公司在港投资的势头持续强劲^①。

(二) 香港经贸未来发展趋势

香港是开放的经济体系,因此,全球经济表现对其非常重要。在未来,外围发展对香港经济的增长仍有决定性的影响。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日益融合,中国因素会继续在推动香港经济的增长上占有重要的席位。

1. 香港应积极参与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利用CEPA优先对香港的优惠条件,努力发展与中国内地的经贸联系,加快与中国内地经贸上的融合。

CEPA是内地与香港经济融合的催化剂。由此引发的利好因素,可望使维系香港拥有的制度和管理优势争得更多时间。但如不善用这些政策,香港对内、对外正面竞争形成,就再无政策优势可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CEPA一样,都是新生事物,并无成规可循,需要港人主动进取,开拓市场。只有积极把握机会,以互惠互利为本,泛珠三角的商机才会真正转化为香港的市场、香港的生意、香港的利润。

由香港参与的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形成,虽然使得中国近1/3的地区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但由于涉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两种货币和两个关税区,这样的组合在中国所有经济圈中绝无仅有。香港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抓住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所带来的契机,香港经济不难再攀登新一轮高峰。

2. 香港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这会促进香港与外国的投资贸易的持续增长。

中国加入WTO已有6年,各国企业面对大陆市场更加开放的机会,均认为香港所具有的优势要进一步发挥,随着CEPA的实施和泛珠合作步伐的加快,更多中小企业开始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作为增加对华投资的基地。而且香港在九七回归后实行的“一国两制”,将使香港继续保持各方

面传统的吸引外资的优势,如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优惠税制、维持国际金融、运输、资讯中心的地位,将其带香港与各国之间的对外经贸投资关系进一步发展。

2005年,有232家海内外公司来港,而在港设立地区办事处的公司创出3800家的历史新高,2006年上半年又有156家海外、内地和台湾企业在港开业或扩充业务,较去年同期增加逾8%。^②这说明香港仍旧是世界各地商家心目中的理想营商地点。

香港是外来直接投资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地,同时也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跳板。^③

3. 香港未来的发展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和“独立经济体”的关系。

1980年代初期,为了减低成本,香港制造业开始外迁到珠江三角洲,服务业的比例迅速增加。香港已成为服务业型的经济,但主要服务对象是在境外。虽然,香港经济结构至今仍在转变中,但其对中国内地依赖性不断增强。

随着制造业的外迁,香港开始失去制造业赚取的大量财富和其提供的就业机会,而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出入口业、运输业也失去本土的服务对象,而必须依赖内地企业的支持。至此,香港已由独立的经济实体变成一个依附于中国内地的服务性的经济体。香港成为城市经济,却没有城市经济的条件 and 环境。这就是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现在所处的困境。

香港未来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与中国内地经济融合和对中国内地经济依赖的关系。若一味的依赖中国内地,那香港作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将不容乐观。因而香港的发展需要弃城市经济思维,而努力建立独立的经济实体,只有如此才能使香港经济发展更具有后续力量。

(责任编辑:黎熙元)

① 《香港仍是外来直接投资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地》,2006年7月12日,新华网

② 《香港力求成为全球投资者的乐园》,香港《商报》,2006年7月13日

③ 《香港仍是外来直接投资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地》,新华网,2006年7月12日

香港经济再发展的哲学思考

彭国题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其他各界,香港经济如何再发展已经成为热点话题。其起因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回归和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两个因素对香港经济的再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究竟将会如何影响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为此又能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各种说法,莫衷一是。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新环境及其自身的条件,站在哲学的高度评判现在流行的关于香港经济的看法,提出香港经济未来可采取的发展战略。

一、影响香港经济再发展的 主要环境因素分析

可以说全球化是现行世界最具特色的经济特征,所有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个体都受到它的影响,香港也不例外。因此,虽然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和起源有许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即经济全球化正在不断地影响着几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成为全世界共有的经济环境因素。经济全球化正在不断重新分配世界的生产要素。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在时间轴上一个国家将分别经历三次产业革命,现在这种产业革命的变化过程似乎从空间轴上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主要还是以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加工品为主,而发达国

家则主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及提供各种商业和技术服务。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也先后经历了这样的阶段。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的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的高。这说明香港曾经一度参加了全球产业中的工业链条,同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生产上进行分工和竞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香港的工业产值一直都是在逐年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却一直在上升,这说明在参与全球竞争和分工的过程中香港工业是逐步萎缩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后面我们也会提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全球化浪潮下,香港在工业方面的竞争力是比不上周边地区的。另外一方面,在分析2005年香港服务业构成时,我们又发现在服务业中,酒店业占了1/3以上的水平,而进出口贸易业也占到了几乎1/4的水平。从全球范围来说,香港已经属于发达地区,服务业已经占到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经历早期一轮产业转移后,香港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旅游和商贸服务的地方,这种变化也是香港自身优劣势和政府所采取的不干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全球分工过程中,如果政府不采取扶持产业的政策,那么其产业结构必将由其天然的自身条件来决定,优胜劣汰,最终形成

表1 香港历年三次产业构成

年份\产业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5	0.1	9.2	90.7
2004	0.1	10.0	89.9
2000	0.1	14.2	85.7
1995	0.1	16.0	83.9
1990	0.3	26.5	73.2
1985	0.5	29.8	69.7
1980	0.9	32.1	67.0
1975	1.4	34.5	64.1
1970	2.0	37.3	60.7

数据来源：相关各年《香港经济年鉴》

现在的状况。在全球化更加迅速和猛烈的今天，香港经济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根据后面所分析的香港优劣条件我们很容易推测出来。

另外，回归祖国是香港面临的另一个大环境。虽然香港回归祖国已经有10年之久，但是香港对这种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还远远不够，“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政策的实施也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仍然是香港面临的新环境。另外，回归祖国对香港的影响不只是局限于政治领域，在经济方面对香港也将产生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香港如何在经济方面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如何在同大陆及大陆以外地区和国家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又要充当什么新角色？这一系列问题到目前为至香港都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最后，现今大陆经济的实力和飞速发展势头也是香港面临的新环境，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因素。大陆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香港也参与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形成了现在两者经济关系相互交融的状况。特别是现在的大陆经济实力与三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其对香港经济现状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有利有弊；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陆的经济实

力将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加大，香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已经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从有利面来说，大陆经济的繁荣为香港资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2004年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达到190亿美元，占中国当年所有FDI的31.3%^①；大陆经济的发展为香港制造商提供了更加巨大的市场空间，2005年香港制造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内地总额达到446.43亿港元，占其所制造的产品总出口的32.8%；香港转口贸易绝大多数都是与大陆相关，在转口贸易中中国内地作为供应地和最终目的地达到了20172.58亿港元，占总转口额的95.4%；来港旅游的客人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大陆，2005年来港大陆旅客达到1254.1万人次，占访港总旅客的53.7%，这对服务业占GDP将近90%的香港来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见表1）；自从一九九三年中国内地公司以H股及红筹股方式在香港上市以来，目前已有234家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占市场总值的47.7%，这对金融业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香港而言，内陆经济发展对其影响力的大小不言而喻^②。

① 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 “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与发展”，陈丽君、彭国题，07年6月1日人民网

从不利面来说,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对香港制造业将会形成新一轮压力,现在香港制造的产品之所以还有市场在于其品牌的价值,但随着大陆各种品牌的培养和出现,香港制造的产品生存空间将被压缩,最终还是会因成本不敌大陆企业而面临困境;这些年大陆的基础设施发展非常迅速,港口的吞吐能力不断加强,2007年第一季度上海港口的吞吐量就已经超过香港,达到588万箱,超过香港38万箱,成为世界第二大港口;^①这对现今以贸易和物流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首的香港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另外,上海金融业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之快,虽然在金融制度和软件方面还赶不上香港,但香港已实实在在感受到他的竞争。

总之,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香港来说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沉重的消息,暗示着香港再也不能等待和观看大陆的发展,也不能只像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台湾地区)那样同大陆只有资本和贸易的往来,应该利用自己与大陆独特的关系,结合自己的特点来发展自己。

二、香港经济再发展的自身条件

(一) 香港的优势

1. 制度优势仍然是香港的王牌。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盛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拥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机制、健全的法律体系及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在将来较长时期内,这将使它在金融、法律、贸易和运输等领域保持亚洲经济中心的地位。

2. 香港营商优势周边地区无法匹敌。香港是亚洲营商之都,这一点即使曾经质疑过香港的《财富》也不得不承认。香港拥有国际化的市场网络、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市场推广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优势。无论外商,台商还是港商都很看重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在大陆设厂的外资企业一般都没有管理或营

销中心。至于蓬勃发展的内地企业更是把香港作为国际化经营的桥头堡而纷纷拓展在港业务,竞相上市。

3. 香港拥有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香港背靠祖国大陆,是亚太航运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唯一对其构成威胁的上海在短期内也是难以赶上。

4. 香港相比于大陆其他城市,她拥有独特的政治优势。既可以像大陆其他城市那样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同时又拥有独立的各种政治和管理权力,这是中国其他内陆城市所不能比拟的。

(二) 香港的劣势

1.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香港服务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是香港的特色也是香港的弱点。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离不开工业基础作支撑。同属于微型经济体的新加坡在这方面就比香港做得好。毫无石油资源的新加坡居然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其他例如电子工业、生物科技及医药产业都发展得相当不错。而香港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工业比重是越来越低,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这种变化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严格按照三次产业定律来变动,它是在工业弱化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而配第一克拉克三次产业定律的一个重要隐含条件便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生产率的提高,绝对产值的稳定或增加,在此雄厚基础上来发展服务业,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皆是如此。因而这也就决定了香港经济的脆弱性、不稳定性 and 严重依赖外部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SARS疫情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2. 香港经济属于迷你型的岛屿经济,尽管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已相当发达,但它缺乏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一般应该具有的市场空间和生产资源条件,因而始终摆脱不了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依赖,这也是香港经济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 and 严重依赖外部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① “上海港跃居世界第二集装箱港”,07年5月9日《光明日报》。

3. 科技水平低下制约香港经济的产业升级。科技水平低,工人素质低下是香港没能完成产业升级,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被淘汰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香港何尝不想实现产业升级,但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欠缺纽约和东京那样的技术环境。纽约和东京之所以成为世界超级城市,其背后是有全美国和全日本的资源做支撑,特别是人力资源(当然也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和人才流动),而香港尽管受益于美日欧产业结构的转移,但其本身并未建立起高端的技术储备,特别是没有建立高端的技术人才储备,这就使它始终无法摆脱对外来技术的依赖,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了;更何况香港全面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政策,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产业政策可言了。

三、对香港会被大陆边缘化的批判

基于我们所分析香港面临的新环境,有人提出了香港将会被大陆边缘化的结论。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说被主流(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经济...)所排斥,所不包容。得出这样的结论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属于典型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即在“两极对立、二元归一”中“争第一”的本体还原论思维方式。所谓两极对立,就是将世界划分为思维—存在或者主—客体等两个完全对立的两面;而二元归一则是在划分了两极后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即坚持两极对立的“归一论”,从对立的两极中去进行绝对一元化的思维。这种本体还原论思维方式首先设定某种作为本原性始基的本体,然后由此出发解释整个世界。其基本论点是:追求终极实在的“始基论”,即在现实中注重探求和设定终极实体,在人始终追求和设定绝对真理。它将世界肢解成两极就是为了强调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本原地位和决定作

用,要进行二元归一。说简单点就是非此即彼的方式,把一方归结为另一方,使一方吃掉另一方来达到其绝对一元化的独断结论。运用“两极对立,二元归一”思维方式,将香港和大陆对立起来,再结合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香港造成压力的实际情况,得出大陆将会排挤香港,将其边缘化的结论。通过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其荒谬之处,没能在“对立统一、矛盾互补”中“求统一”,即他只看到香港与大陆矛盾的一面,没有看到香港与大陆统一的一面,没有从他们完整的相互关系中看问题。一方面,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香港既会造成压力也会带来巨大的机会;另一方面,香港也不是一无是处,香港有香港的长处和特色,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在很多方面它比大陆要优秀很多。由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可以预见大陆将来与香港的关系:两者将会各发挥自己所长,相互进一步交融,各具优势和特色。

四、香港经济再发展可采取的战略

首先,必须转变观念,彻底从“两极对立,二元归一”的错误思维方式中转变过来,运用“对立统一、矛盾互补”中“求统一”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不要非在香港与大陆之间选出一个主流,而是要辩证地看待各种实际问题。对于香港而言,既要看到来自于大陆的竞争压力又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所在;既要加强同大陆的合作与沟通又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保持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既要利用已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又要看到它的缺陷和不足;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正确找到香港经济再发展的战略。

其次,引入政府来调节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香港的特色,它为香港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在这方面是大家所共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它能带来有利的一

面也必将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客观规律,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由于香港长期坚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严重弱化了香港自身的宏观控制和规划能力。这也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缺乏明确的目标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对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负面影响的研究,经济学界主要是集中在市场失灵部分,而政府干预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办法而被很多经济学家所推崇。政府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它的积极面主要是对经济发展具有全局计划和长期战略,能迅速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事情;它的负面作用主要是政府干预具有渗透性,如果把握不好度就容易因政府干预而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现在的香港一方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缺乏战略而出现严重问题。因而结合香港现在的实际情况,适当引入政府调节作用对现今的香港最为有利,是现今香港必须要做出的现实选择,这也是适应时代的需要。

再次,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很多人认为香港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客观条件,否则香港工业早就完成升级了。但是,现实迫使香港必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香港的转口贸易95%以上是来自于大陆或者以大陆为最终目的地(2005年数据),但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经济的迅速融合,转口贸易量将会越来越小;另外,中央开放大陆居民到香港旅游属于典型的输血措施,在短时间内对香港经济是一支强心剂,但过不了多久,大陆居民到香港旅游的量将逐渐趋缓,然后不变,甚至减少,如果那时香港经济仍然依靠大陆居民旅游来拉动则其经济增长将会陷入停滞阶段,甚至负增长。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如果香港继续采用现行的发展战略,这两方面的减少对未来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致命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我们也可以得知,一个完整的经济体不能没有工业做支撑,否则经济发展将很不稳定。

上述影响香港经济再发展的客观因素要求香港必须做出改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香港的客观情况共同决定的,另外香港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环境,即既可以利用大陆在科技方面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又可以利用自己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有利条件。现在唯一缺乏的是统一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因而,香港应该打破传统的认识,引入政府来规划经济,指导经济发展,这不是使香港丧失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而是解决香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局。

另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及时转变策略,将服务业方面的优势全面拓展和外延,抓住大陆经济发展的势头。一方面,香港作为大陆企业走向国际化和融资的前沿阵地,在企业贸易、融资和国际化合作等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大陆的服务业正处在全面发展和升级阶段,这对香港而言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为香港服务业的外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参考文献:

1. 相关各年《香港经济年鉴》(文中所有未标注的数据)
2. 《“争第一”抑或“求统一”——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启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王晓林著
3. 香港比较优势、发展瓶颈和经济复兴,章玉贵,《商业研究》,2006年第14期
4. 政府干预的绩效评估标准,张志敏,《理论学习》,2000年第4期
5. 香港边缘化危机与定位,陈剑,《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周多天)

香港总部经济的发展

——对香港国际商务之都的微观分析

关红玲

近年来国内学者掀起了研究及发展城市总部经济的热潮。而香港作为国际商务之都,堪称是发展总部经济的典范。本文试图站在价值链以及服务业发展特征的角度,探讨香港总部经济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总部经济及相关理论

(一) 总部经济概念及其经济意义

1、总部经济概念(赵弘, 2004)^①: 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 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 从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 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赵弘指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出现了两种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 特别是一批民营企业集团, 由欠发达地区向中心城市“迁都”。另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心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 却把企业总部, 包括销售、研发等部门依然留在

城区范围。简而概之——总部与加工基地不断分离, 这实际上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一种新方式、新动向。由此会对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本人认为, 赵弘研究员将总部经济研究对象局限于制造企业, 忽视了现实中服务产业, 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企业总部聚集于某一城市的现象。因此应该把制造业企业将总部布局于城市内作为总部经济中的一类, 总部经济另一类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总部在城市内聚集——高附加值与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 以实现价值链与区域资源最优配置。

2、总部经济意义

(1) 总部经济的三赢模式:

如果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 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 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 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了两个不同区域最优势的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不但能够使企业取得在原有布局模式下难以取得的资源优势, 实现资源配置综合成本最低化, 而且使得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密集

^① 赵弘: 《总部经济》,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14页。

的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释放,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密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所以,笔者将总部经济模型称为“三赢模型”。

(2) 总部经济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所在区域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无论采取哪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所得税,在我国现行税率之下一一般为33%。如果企业采取“公司一分厂”组织形式,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以及城建税、教育附加等一般也要在企业注册地,即总部所在地上缴。二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二是“产业乘数效应”(产业溢出效应)。制造业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制造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组成的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制造业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都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制造业总部的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

动、研发活动以及保障商务活动和研发活动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消费;另一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旅游、购物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的发展本身会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智力人才优势,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总部经济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再造,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二) 总部经济基础理论——价值链、比较优势、交易成本

总部经济分析基于多个视角:

1. 价值链

从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研发、新产品设计、模块零部件生产、组装加工、营销、售后服务。其中利润空间最大的是两头,而组装加工即生产环节是利润空间最小的环节。因此当生产越来越标准化,运输成本及外部购买交易成本降低时,企业将考虑将价值链上附加值较少的环节分离出去。从而形成两头即总部向城市聚集。

2. 比较优势

正如上述,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价格差异程度不同,企业将价值链上活动区分为高价值与低价值活动,并根据区域中比较优势进行布局,将利润空间大,价值创造活动放在战略资源(信息、高级人才等)有优势的中心城市;将利润空间小的生产组装活动配置在常规资源(土地、能源、材料及一般工人)有成本优势的城市外围。区域

间比较优势的来源有要素禀赋的空间不平衡程度、区域性制度差异、生产要素本身的不完全流动性、区域间本地知识系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效率等。

3. 交易成本

总部经济形态的形成将主要取决于地区间生产要素价格差异程度、企业组织协调成本的增加量、产品研发设计管理等中间价值活动的可交易程度、市场交易费用等因素。其中影响企业中间价值活动的市场交易成本的主要因子包括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交易频率、中间价值活动的不确定性和种类、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的市场环境等;影响企业组织协调成本增加量的因素有信息传输方式、空间距离、环境因素等,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总部经济形成的客观基础。

此外还包括企业能力理论等。

(三) 总部经济的特征

本人认为一个发展成熟总部经济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一、有为数众多跨国公司在该城市聚集多。跨国公司纷纷在该城市设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这就是该城市总部经济最直接表现。

二、服务业无论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就业比重占主导地位。总部经济,从价值链角度看,就是将低利润生产加工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将利润高前后环节——研发、设计、管理、营销、售后服务等放在中心城市,因此从该城市产业这一层面看,聚集在城市的就是一些生产性服务业。贸易、保险、物流、金融、专业服务等。

二、香港总部经济

(一) 香港总部经济的特征

1. 跨国公司驻香港地区总部和办事处数目庞大,增长迅速

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之都,其总部经济特征明显。按母公司所在地统计的驻港总部和办事处合

共达3845家。

(1) 驻香港地区总部

地区总部^②是指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对区内(即香港及另一个或多个地方)各办事处拥有管理权的一家办事处。2006年在香港设立总部的有1228家,从1991到2006年,外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数字以年均5%的速度增加,其中2003到2004年由于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签订,该数字增幅达14%。从国别比较,增幅超过平均数的有日本、德国、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从绝对数看,美国、日本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数目分别位居各国之首一、首二。(详见表一)

(2) 驻香港办事处

地区办事处^③是指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负责协调区内(即香港及另一个或多个地方)各办事处及/或运作的一家办事处。2006年在香港设立地区办事处的有2617家,从1991到2006年,外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数字以年均15%的速度增加。从国别比较,增幅超过平均数的从高到低有台湾、新加坡、法国、澳大利亚、德国、韩国;从绝对数看,仍是美国、日本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数目分别位居各国之首一、首二。

比较两者,1991年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外国公司有602家,而设立地区办事处有278家;但1992年后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的公司757家,超过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588家,可见在1991年前多数外资公司把香港作为地区总部,管理协调区其它办事处,1992年后转变为把香港作为区内协调功能为主的办事处。而且在香港设立地区办事处的公司数字以15%比例大幅攀升。可见香港作为国际商务之都地位日益稳固,总部经济特征日益明显。可惜没有这三千多家驻港总部与办事处详细资料,包括经营业务、管理协调的区域范围等。从而无从确定香港总部经济辐射范围以及投资行业,从而难以确定其在香港从事经营环节到底是

②③ 注释来自香港政府统计处。

表一 按母公司所在的国家/地区划分的驻港地区总部数目

年	驻港地区办事处数目	母公司所在的国家/地区								
		美国	日本	英国	中国内地	德国	法国	新加坡	台湾	澳大利亚
1991	602	258	44	75	***	30	25	***	***	9
1997	903	219	119	84	113	51	35	18	28	14
1998	819	194	109	95	70	59	38	17	26	16
1999	840	205	114	82	69	55	36	20	28	9
2000	855	212	127	81	69	50	28	21	21	9
2001	944	221	160	90	70	56	43	25	22	15
2002	948	233	159	80	96	52	35	26	21	13
2003	966	242	168	86	84	56	44	22	18	22
2004	1098	256	198	105	106	67	47	35	29	18
2005	1167	262	204	115	107	75	49	45	33	18
2006	1228	295	212	114	112	76	55	44	28	21
平均增长	5%	1%	10%	3%	4%	6%	5%	17%	6%	5.6%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局网站（政府统计处业务展望统计组，修订日期：2006年9月26日）

位居价值链的哪一环节。

2. 发达服务体系，在经济中居首要位置

正如上述，城市总部经济就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与成熟。香港的服务业体系完善与发达，并且有许多世界第一的美誉。2004，服务业在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所占比率为90%。即使扣除公营部门所占比率，服务业仍占2004年本地生产总值约79%。

80年代香港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将制造业内迁，经济从制造业为主导向服务经济转型，香港集贸易、服务、金融、航运、信息和旅游为一体的国际商业服务中心由此形成，目前香港是亚洲太平洋区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第六或第七大国际金融中心（饶余庆，1995）。1999-2003年间香港货物贸易位居世界第10-11位，香港服务贸易名列在第9-10位。此外香港还享有世界第1、第2货柜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的美誉。

（二）香港总部经济的表现形态成为其经济体系中支柱

正如上述，外资在本市设立总部及办事处的数量是衡量总部经济发展成熟一个标志外；在产业层面就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香港服务业占经

济主导地位，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更成为经济主导。

1. 香港服务业中金融服务、贸易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支持服务四大行业，逐渐成为香港经济中的四大支柱。

（1）四大支柱在香港GDP中地位举足轻重。

从下表可见，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旅游共占本地生产总值50%左右。其中前三类服务业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总部经济产业表现，它们共占香港GDP45%-50%，是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其中贸易与物流比重最高达23-28%以上，其次是金融服务与专业服务都在10%以上。（详见表二）在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大多与内地制造业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香港制造业外迁珠三角后，本地留下的就是从事订单处理、采购、管理、贸易代理等与进出口相关的业务，也就是价值链中前后中的部分环节。这与总部经济概念是十分吻合的，根据香港与内地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合理将价值链上高增值部分留在香港，而低附加值部分迁到珠三角。

（2）四大支柱在香港总就业中地位举足轻重。

从下表可见，香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旅游共占香港总就业人数43%左右。

表二 香港经济四个主要行业——占以要素成本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百分比

百分比 (%)		年份	199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 金融服务			10.3	11.9	11.3	11.5	12.3	12.2
	银行		7.9	8.4	8.2	8.2	8.5	8.0
	保险		1.0	1.1	1.2	1.3	1.5	1.4
	其它金融服务 (例如: 证券经纪, 基金管理, 融资租赁公司和投资及控股公司)		1.4	2.4	1.9	2.0	2.4	2.8
(2) 旅游			3.1	2.3	2.2	2.8	2.3	2.9
	(甲) 入境旅游		2.5	1.6	1.5	2.0	1.6	2.2
	(乙) 外访旅游		0.7	0.7	0.7	0.8	0.7	0.8
(3) 贸易及物流			22.7	23.8	24.3	25.0	26.3	27.6
	(甲) 贸易		18.7	19.4	20.0	20.5	21.5	22.3
		批发贸易	1.2	0.9	1.0	0.9	0.9	1.0
		进口与出口贸易	17.4	18.5	19.0	19.6	20.6	21.3
	(乙) 物流		4.0	4.5	4.3	4.4	4.9	5.3
		货运及仓库服务	3.5	4.0	3.9	4.1	4.5	4.9
		邮递及速递服务	0.5	0.4	0.4	0.4	0.4	0.4
(4) 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业支持服务			12.4	10.2	10.4	10.3	10.3	10.5
	(甲) 专业服务		3.3	3.4	3.3	3.3	3.6	3.7
	(乙) 其它工商业支持服务*		9.1	6.8	7.0	7.0	6.8	6.8
四个主要行业=(1)+(2)+(3)+(4)			48.5	48.3	48.2	49.5	51.2	53.3

资料来源: 香港政府统计局网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key_economic_and_social_indicators/index_tc.jsp。修订日期2006年5月23日

其中前三类作为总部经济表现形态——生产性服务业, 它们共占香港就业总人数40%左右。其中贸易与物流比重最高达24%左右, 其次是专业服务都在10%以上, 金融占5%左右。

从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来看, 香港这三大生产性服务业为香港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与其在GDP占居地位是相对应的。从相对生产率来讲, 金融服务业是效率最高, 以5%就业, 创造10%以上的GDP, 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是效率最高, 这间接反映相关金融业技术效率高, 运用较为先进的科技与管理。旅游服务相对生产效率较低, 以占就业人口4%比例, 创造价值占GDP比重只有3%。

2. 大部分外来投资投向四大支柱产业。

反映总部经济的生产性服务业, 在香港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表现在其对香港经济与就业贡献, 从外来投资导向也可看到, 反映香港总部经

济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

从总体看, 香港外来投资93%以上投入服务行业, 制造业只占2%。从投入服务业中细分, 香港外来投资流向有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 其余平均36%资金流入生产性服务业 (详见表三)。因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地位是很重要的。

三、香港总部经济的发展问题及前景

(一) 香港总部经济发展问题

1. 服务业沉没成本较低容易迁移。

如上所述, 总部经济产业反映就是生产性服务业, 而目前服务业的迁移即离岸服务业发展随着科技进步日益蓬勃, 加上服务业沉没成本较少, 由此迁移成本较低, 不像制造业需要大型土地、厂房与机器设备。还有服务业一般有消费与生产

表三 按香港企业集团主要经济活动划分的香港外来直接投资 (以市值计算) 十亿港元

经济活动	年底的外来直接投资头寸									
	2001	比重	2002	比重	2003	比重	2004	比重	2005	比重
投资控股、地产及各项商用服务	1,805.5	55%	1,367.0	52%	1,646.3	56%	1,987.8	56%	2,410.3	59%
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	406.5	12%	341.4	13%	408.8	14%	516.5	15%	556.0	14%
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	365.3	11%	325.4	12%	414.6	14%	481.2	14%	510.0	13%
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	110.9	3%	90.7	3%	108.8	4%	148.9	4%	155.9	4%
运输及有关服务	96.6	3%	78.2	3%	69.3	2%	74.5	2%	101.3	2%
保险	70.1	2%	85.9	3%	71.0	2%	80.4	2%	74.7	2%
制造业	73.0	2%	72.8	3%	64.7	2%	68.7	2%	70.5	2%
通讯	80.6	2%	69.0	3%	44.8	2%	39.0	1%	43.5	1%
建造	42.4	1%	36.8	1%	28.5	1%	24.5	1%	35.1	1%
食肆及酒店	44.4	1%	43.1	2%	28.8	1%	35.6	1%	25.8	1%
其它活动	174.3	5%	112.0	4%	74.9	3%	64.8	2%	73.2	2%
所有经济活动	3,269.7	100%	2,622.3	100%	2,960.4	100%	3,521.9	100%	4,056.3	100%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局网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key_economic_and_social_indicators/index_tc.jsp。修订日期2006年5月23日

同时进行，因此香港服务业，随着内地经济快速发展更容易迁移与被替代。

2. 能否将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留在香港仍有待观察。

目前金融服务以迂回投资与房地产为主。如上表，大部分外来投资以及香港对外投资投入房地产相关行业，而非生产或生产性服务业。而且无论从投资来源地划分的香港外来投资，还是从受资地的香港对外投资观察，香港大部分资金来自于中国内地，同时又投资于中国内地，因此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报告中指出，香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中，涉及到中国大陆和避税港的迂回投资约占25-40%。

而且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容易催生经济泡沫。

(二) 香港总部经济发展前景

香港总部经济发展十分成熟。无论从驻港地区总部与办事处总数之多，增长速度之快；还是从反映总部经济的生产性服务业之发达及经济就业投资中比重之重要。目前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把价值链中高增值环节、沉没成本较高的不容易迁移的环节留在香港，比如研发等。香港总

部经济发展水平之高有目共睹。但由于资料限制不能深入分析，许多问题有待探讨，例如其主要辐射范围，从事价值链哪些环节等等。

参考文献：

- 1、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9月
- 2、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
- 3、赵弘：《2005-2006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
- 4、香港政府统计局网站
- 5、李江帆、顾乃华：政府市场营销与总部经济，《江海学刊》2005年1期
- 6、赵弘：总部经济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江海学刊》，2005年1期
- 7、王军等：对总部经济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理论学刊》2005年11期

(责任编辑：周多天)

浅析新时期香港的投资环境

尹丽丽

一、香港吸引投资的现状

香港继续保持亚洲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地位,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量则全球排名第六。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2005年来直接投资达359亿美元,高于新加坡(201亿美元)、韩国(72美元)及印度(66亿美元)的总和。^①

1. 近期来港投资设点的海内外公司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涉及的行业领域越来越广,既有律师行、金融服务公司,又有高科技及电讯公司;既有餐饮、零售企业,又有文化、创意机构,可谓百花齐放。

第二,来源区域分布更广,特别是内地企业增长显著,来势可观。除了欧洲、亚太区及北美等传统市场占主要地位之外,内地企业也有超过一成三的比重。

第三,外来投资业务多元化,不仅为香港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商业活动,还带来了崭新的营商概念和技术,对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创新大有裨益。

2. CEPA对吸引投资者来香港持续显示正面影响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吸引投资者来香港持续显示正面影响。在2006年上半年投资推广署协助的公司当中,约1/4的公司表示,“安排”是吸引他们来港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签订的补充协议下,更多香港公司可享有进入内地市场的特别优势。

2006年1至6月,内地企业占香港投资推广署已完成的投资推广项目的13.5%,显示内地公司在港投资的势头持续强劲。欧洲、亚太地区及北美等传统市场仍然是2006年1至6月香港主要投资项目的来源地。2005年,公司地区总部及地区办事处在香港的数量也创下历年新高,达到近3800家。^②

3. 香港加大推广力度,吸引企业赴港投资

为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赴香港投资,香港将投入更多资源在内地市场,向内地企业提供更细致、全面的服务。2006年6月28日,香港投资推广署及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在广州举办“投资香港日”,并宣布成立“投资香港服务中心”。为方便内地企业了解香港的营商环境及投资程序,香港投

^① 《香港外来直接投资达359亿 全球排第6亚洲居第2》,中国网,2006年10月18日

^② 《香港仍是外来直接投资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地》,新华网,2006年7月12日

资推广署还特别为有意通过香港拓展海外市场的内地企业开设“投资香港一站通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已在2006年6月份设立了投资推广小组及“投资香港服务中心”，而驻粤办的投资推广队伍也会进一步扩大，服务的地区由原来的广东省扩展到福建、江西、广西和海南。2006年下半年，上海和成都两地也将成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并设立投资推广小组；香港投资推广署2007年3月14日又在上海成立了常设机构-投资香港服务中心。2006年，这家投资推广署共协助来自全球各地的246个投资项目落户香港，其中41个来自内地，占总数的17%。^①

二、香港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的状况由界内投资环境决定、界外经济背景影响。界内投资环境，从投资环境的角度看，它是指特定的划为接受外资地区的必要投资条件，是吸引外资的最主要依据；界外经济背景是指周边地区的经济环境，它是影响双方合作经济效果大小的条件。

香港优良的界内投资环境和以内地为背景的界外经济投资效应使香港成为西方国家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在海外的重要投资场所。

(一) 界内投资环境

1. 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香港地理环境优越，是连接北美洲与欧洲的桥梁，与内地和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系联系紧密，又与世界各地建立了良好的通讯网络，因此能够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此外，香港金融市场的特色是资金流动性高。市场根据有效、具透明度而又符合国际标准的规例运作。香港的工作人口有一定教育水平，海外专业人士来港工作，也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全球约有3600家公司选择在香港成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2004年，各地公司在香港设置地区

总部数目增加至超过1000家，创历史新高。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银行中，超过70家在香港营运。香港现有310多家银行机构和180多家保险公司，另有大约700家证券经纪行和1900家单位信托基金或互惠基金公司。^②

2. 全球经济及信息最自由地区

香港是全球经济最开放和最外向型的地区之一。健全的金融体系和稳健的经济基础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香港设有自由开放的投资制度；不设贸易屏障；对外来投资者一视同仁；资金自由流动。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05经济自由度指数，继续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使香港连续第11年维持在评级的榜首。美国加图学院联同全球50多个经济学会，亦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而在品牌的推广上，香港更可提供有利的国际平台。香港的信息自由，对外信息的交流频繁。同时香港每一年也有多个不同行业的国际性大型展览及会议，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品牌的推广，开拓更多更广的商机。

3. 低税率及简单税制

香港的税制简单而明确，利得税为17.5%，薪俸税税率最高为16%，税率属全球最低之列。香港不征收资本增值税、股息税、利息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其它隐藏的“附加”税项。企业进口机器和原料无需缴付关税。另外，只有源自香港的收入才须缴税，在香港以外所赚取的收入均无需缴税。对于研究及开发工作，香港推行优厚的税项宽减措施，可扣税的项目包括市场研究、可行性研究及其它与商业及管理有关的有关研究活动的开支。

4. 廉洁政府，法制社会

香港拥有一个架构精简而效率高超的政府。香港政府素以效率出众、透明度高兼处事公正见

^① 《香港投资推广署在沪成立服务机构》，国际金融报，2007年3月15日

^② 《香港的优势》，香港投资推广署网站

称。在工商业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奉行确立已久的“尽量扶助、减少干预”政策,乐于支持工商业发展。香港特区政府一贯保持廉洁和高效率,务求创造有秩序及自由的投资环境。香港的法律制度深可信赖。香港市民和居港人士得享的权利与自由,建基于大公无私的法治体制、独立的司法制度、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香港是法治社会,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确保香港的投资环境安全稳定;在保护企业的权益方面,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可以确保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应有的保护,这对高科技的企业尤其重要。

5.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基础建设

香港有大量技术并且通晓两文三语的劳动人口,再加上多方面的专业服务人才,如会计、法律、金融和评估等行业,这是邻近地区所不可以比拟的。他们不但拥有国际视野,又明白国情,在了解西方文化之余,也深明中国文化的特性。这种种因素都能配合企业的发展,提升企业的素质。

此外,香港具备世界级的基础设施。除了拥有世界最繁忙的海港和空运货柜港口外,香港还可提供最先进、高效率及符合成本效益的电信服务。香港的电缆和卫星网络居亚洲覆盖范围最广之列。其它有关建设也在不断改进中:香港计划在未来五年大规模扩展铁路网,加大土地、道路建设、新市镇发展、政府建筑物、学校和小区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等投资。

(二) 界外经济背景

1. 面向东南亚的经济地理位置

香港面向的东南亚,是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但又蕴含着生机的发展中地区。那里需要借助香港以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西方企业进入东南亚也多以香港作为跳板;这一地区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定,又使香港成为其资金的“避风港”。故此,面向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又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机会。

2. 背靠大陆和CEPA带来的优惠及商机

随着内地经济持续改革开放,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香港作为内地服务枢纽的角色将会日益重要。香港是进军内地市场的外国企业的贸易伙伴,同时亦提供各类商业支援服务,在这方面所担当的角色,非常重要。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企业有意对外拓展业务,香港也可扮演中介人的角色,以协助这些企业打入海外市场。

CEPA为香港本地公司、跨国公司以及国内企业提供了崭新商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内地与港澳加强包括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等7个领域的合作。CEPA以条约规范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模式,在内地服务业整体开放的进程中,适当提前对香港开放的照顾香港服务行业的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特点,降低进入门槛、对香港居民准入的条件适当放宽、灵活定义香港公司等,对于香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将起到推动作用,并帮助香港企业开拓内地市场。

3. 各国与香港广泛的国际经济关系

自建立自由港以来,香港与世界各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自行处理对外事务。香港参加了超过190个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参加了超过20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劳工组织;签署了超过160份双边协议,包括资讯科技合作、海关合作、避免双重征税、卫生防疫等等;共1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港设有领馆和官方机构。^①

三、对香港投资环境的评价

(一) “投资乐园”还是“投资陷阱”

香港投资机会多,投资的配套环境完善和投

^①《曾荫权:回归后香港与世界各国保持了紧密联系》,新华网,2007年6月6日

资回报率高。香港的信息资料丰富且信息极为灵通,及其自由港政策体系为中心的聚商环境及灵活的商业运作环境,使香港充满着投资机会;香港在营商方面,不论硬件环境、软件环境还是产业环境都十分完善。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中,投资回报率明显比其它地区高。所以很多企业将香港视为一个“投资乐园”而积极寻找机会到香港进行投资。

但是,国际市场的多变性和难控制性,使香港经济的发展充满变数且显得扑朔迷离,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不同时期,香港经济的结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为香港提供的机会而不断地变化着,因而具有较佳的发展潜质及投资回报率的行业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发展更替的。二是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大,高度地与国际市场融合,导致除本地因素外,海外市场稍有风吹草动,香港的经济也就跟着波动,其中以股市、汇市及楼市最为敏感。一遇到好消息,它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上扬;而一遇到利空因素,它们同样会在瞬间内下滑。为此,仅将香港看成一个“投资乐园”,而忽视其投资风险,香港最终可能会成为投资者的“投资陷阱”。

(二) 制约香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

联合国发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香港2005年吸引外资流入的速度较前年明显放缓。报告还显示,香港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已较新加坡及内地逊色。此外,港府同期的统计数据亦显示,本港2006年第二季吸引FDI数额较去年同期倒退4.6%。但目前多种迹象似在预警,香港的FDI恐难维持高增长,更面临投资环境失去优势的隐忧。

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主要由跨国企业的并购推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额增幅放缓,主因是在港进行的并购相对较少,而且香港的FDI已达高位,可能会减少。但香港2005年鲜有大规模跨国企业并购活动,以致FDI增速放缓只能

算是重要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地区投资格局及香港近年营商环境均发生了变化。

1. 亚洲各国家、地区吸引外资的差距在缩小。例如,香港2004年接收的FDI金额为340亿美元,同期猛升150%;2004年新加坡接收的FDI金额为161亿美元,同期上升41%;2004年流入中国内地的FDI则为606亿美元,较2003年的536亿美元上升13%。但是在2005年,流入香港的FDI金额是359亿美元,按年增幅仅为5.6%;而中国内地在2005年接收的FDI金额则为724亿美元,按年增幅为19.5%;新加坡的增幅则是25%。

2. 香港的辐射作用减弱。一般流入新加坡的外来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和欧洲。通常来讲,外资到新加坡,既是看重新加坡的投资环境,也是看重它在东南亚地区的辐射能力。而流入香港的FDI则最主要来源于中国内地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此外,外国投资者看重香港之余,其实也希望借香港独特的地理、制度和文化优势,抢占内地的庞大市场。因此,现在香港还可以为自己的“双向交流平台”角色沾沾自喜,但随着内地城市开放程度扩大,外资可以更直接地流入内地,香港吸纳外来直接投资的能力恐怕会受到很大的挑战。近年来,内地像磁铁一样吸入外国公司和专业人才。外籍人才的流动也是外资流动的先兆和表现之一。为了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中央一定会维持香港竞争力。但若香港过于依赖内地,终会导致香港竞争力萎缩。

3. 港经济转型暂无引资新亮点。香港目前正面临产业结构转型。过去几年,特区政府虽不断提出着重发展多项产业,例如‘创意产业’、四大支柱产业——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等,但香港的核心经济条件实际上未发生根本改变,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还未出现。这对外资投资的经济性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4. 环境因素阻港‘吸金’。香港自身营商环境

的变化对外资流入亦会产生重要影响。香港投资环境变差的因素包括空气污染严重和房租猛涨,因这两个因素均推高了跨国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对外资流入香港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近几年,香港的空气质素不断下降,迫使一些外籍人士离开,也使得聘请外籍员工变得益发困难,不少海外企业须为留港员工提供高达15%的额外生活津贴,这变相增加了企业的成本。2005年,香港的写字楼租金首次超越东京,成为亚洲区租金最高的地区,升幅达61%,在全球117个城市中亦居首位。而这一轮‘惊人’的涨势至今未有减弱的苗头。这也让不少外国公司对香港望而却步,转而打算到亚洲其他地区投资。

5.政策变化增外资观望氛围。对于港府开征销售税和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的争论难免会影响到外资的积极性和投资信心,但情况不会很严重。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年全球竞争力头五位的国家,如瑞士、芬兰、瑞典、丹麦和新加坡都有开征销售税,反映该税种对竞争力的影响不大。倒是曾荫权提出要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引起了各界对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讨论,才让人联想香港未来的营商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来看,港府政策方向调整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投资信心和观望氛围上升方面。

6.制约内地民营企业到港发展的主要因素

(1) 成本因素。香港聚集着大量的游资,筹资方便,但内地企业在香港筹资,成本并不是最经济的。原因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便是不断地走向证券化,而香港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要传统特色、优势却是以银行及银团贷款为主。用这一方式贷款,只要投资方案在经济上可行或有可靠的担保,是很容易在香港的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但与银行机构筹资相比较,这种筹资方式所花的成本显然要高很多。因此,在香港筹资,必须注重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经济、合理的融资方式。

(2) 其它原因。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组成的联合课题组推出了一份《鼓励广东民营企业到香港发展的研究报告》(下称《报告》)。课题组通过对广东511家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对民企赴港发展作出了判断:内地民企赴港投资仍处初级阶段。课题组对制约民营企业到港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综合探讨。其中,内地制约因素主要有:融资难、人才短缺及政策障碍,而香港制约因素主要有:经营成本高、竞争激烈。另外,香港与内地的信息不对称也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到香港的发展。

(三) 香港投资环境变化的趋势

在“边缘化”议论不绝于耳之际,投资者用真金白银为香港投下信心一票,确实令人欣慰,这其中当然离不开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完善的法制环境、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等优势;更加离不开背靠高速发展的内地这一优势,特别是CEPA的落实和深化、“泛珠”区域经济整合等,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诱因。

1.特区政府近年来在对外招商推广方面的努力耕耘和创新实践,也是取得引资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在海外方面,特首、财爷亲自出马,与广东、深圳等省市共同组团赴美加韩等地联合招商,声势之浩大,效果之明显,也是前所未见。

2.香港自身的投资推广活动为外资进入创造了条件。香港投资推广署推出一项专为内地企业而设的投资香港一站通服务,主要包括《投资香港热线》、《投资服务中心》、《投资香港锦囊》及《手把手助内地企业投资香港手册》等。2006年上半年香港投资推广署成功协助156家外资公司在港开业或扩充业务,这156个外资项目为香港创造逾4200个职位,初步投资额超过68亿港元。欧洲、亚太区和北美等地仍然是主要投资项目的来源地,分别占总外资公司数量的35%、26%和22%。

3.CEPA优化了香港投资环境。CEPA实施以来,内地企业赴港投资的热情更高。在海外推介

CEPA时向外商强调, CEPA是不断更新的贸易协定, 即使现在某个公司未能享受CEPA的优惠, 但有可能将来的CEPA就会涵盖这个公司或公司所在的行业。相信随着CEPA的进一步深化, 它将成为香港吸引外资的又一亮点。与日俱增的内地投资显示香港作为跳板的角色日渐重要。据统计, 2005年经商务部审批的内地赴港投资企业有253家, 比上年增长58%, 2006年一季度, 经商务部及地方省市批准赴港投资的内地企业共57家, 投资额达3.22亿美元。香港应更加努力, 创新对策, 争取吸引更多商家和资金汇聚香港, 使香港成为全球投资者的乐园。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FDI对香港的意义和作用不言而喻, 因其不仅带来投资金额, 亦为香港带来创新的科技、产品及服务, 并创造更多职位。在短期内, 本港吸纳FDI增速放缓产生的负面影响虽然有限, 但若成为长期趋势, 则势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品质, 还涉及香港长远作为金融中心的危机。未来香港应致力于

提供更多的金融业务创新、合作方式创新及服务方面的创新, 以吸引投资者, 即要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快马加鞭', 保持优势。此外, 空气污染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否则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国公司转到其他地区投资。但改善环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些外企未必有此耐心。因此港府既需在此方面做出实质努力, 也应与社会和投资者加强沟通, 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均不可偏废, 才能维持本港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杨英《香港经济新论》,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2. 卢采受、卢冬青:《香港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第一版
3. 香港投资推广署<http://www.investhk.gov.hk/>
- 4.《香港经济年鉴》

(责任编辑: 周多天)

(上接第54页)

这个预测高估了香港港口的发展, 而无视珠三角港口群的发展与竞争, 预测香港2020年达到4020万个TEU的吞吐量, 不仅要在13年内建成10~13号4个货柜码头以扩大1600万个TEU吞吐规模, 还需配套建设港口铁路货运专线, 与内地铁路联网, 争取开辟多条中长途货运直通车, 开辟新的浞泊区以吸引珠江流域内河船到香港中流作业, 还要为物流业提供更多的后勤用地等, 关键是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建码头, 而不被深圳继续吸引走, 这就要保障码头投资者的回报率不低于深圳、就要与投资房地产、股市的回报率相接近, 否则再空喊10年仍然无果而终。“报告”说, “据政府推算, 从作出决定到10号码头完成, 最少要花十年时间”, 真是这样的话, 10号码头建成之时, 也就没多大意义了。

4、现时香港是大珠三角港口群的主要投资者, 香港港口吞吐量加上香港在深圳、珠海、江门、佛山、惠州港控股的吞吐量已接近4000万TEU,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香港仍然是世界第一货柜港, 不过, 其作业区已延伸到境外。香港机场投资管理珠海机场为香港投资经营大珠三角机场群拉开了序幕,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香港物流企业投资经营珠三角的港口、机场、物流企业, 有人担心会使香港物流业空洞化, 为此要对投资港珠两地物流业在投资效益、就业、消费、税收, 降低珠三角港资企业运输成本等方面作出一个全面的比较, 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和决策。

(责任编辑: 周多天)

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及其防治对策*

郭天武 陈 迪

一、跨境黑社会犯罪的概念

首先必须明确跨境犯罪的涵义。关于跨境犯罪的定义,概括来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跨境犯罪是“犯罪行为的准备、实行或犯罪结果跨越了一国内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域,使得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法域的法院都可以依照各自的法律对其进行刑事处罚”^①;第二种意见认为,跨境犯罪应分为实质的跨境犯罪与形式的跨境犯罪,前者指犯罪的主体和行为事实带有跨境因素,属于真正的跨境犯罪,后者指犯罪的主体、行为、结果等均为无跨境因素,只是犯罪人在其所在地域犯罪之后,为逃避法律制裁进入到另一法域,其实质是刑事司法协助问题^②;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按照实证犯罪学的观点,当犯罪行为 and 犯罪结果或犯罪交易发生在两个地区或国家即两个不同法域,并违反了它们的法律时,该犯罪就通称为跨境或跨国犯罪^③。

三种意见可以说是从不同角度对跨境犯罪作出定义,第一种和第三种意见其实要件是近似的,而第二种意见将跨境犯罪进行区分,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类型跨境犯罪采取不同的对策办法。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跨境犯罪,是犯罪学或犯罪

侦查学的概念,而非一种罪名。另外,从上面的定义可知,分为跨越国境的犯罪和跨越边境的犯罪,对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则特指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跨越边境的犯罪,又称越境犯罪。^④本文所称跨境犯罪,采用的也是这个层面上的意义。

其次是黑社会犯罪的概念。到底什么是黑社会?不少书籍、电影都对黑社会的各种行为,如收数,勒索等有详细、深入的描述,但对其概念的界定则并不多见。黑社会犯罪,实际上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⑤。国际刑警组织第一届反有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将有组织犯罪定义为“任何企业或群体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而从事连续的、有时

① 赵秉志等.跨国跨地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3-4.转引自:李娜.论跨境犯罪的特征及发展趋势[A].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② 杨方泉.论内地与港澳台跨境犯罪二分法及其意义[J].政法学刊.1997.(4)

③ 周密.论跨境犯罪及其控制策略[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4).

④ 任克勤,陈秀云.改革开放前沿的跨境犯罪问题研究[J].公安大学学报.1997.(5)

⑤ 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众说纷纭,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参见:康树华,魏新氏.有组织犯罪透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

※本文受广东省社科基金资助,是“内地与港澳法律体系冲突与协调”的前期成果。

是跨国的不法行为”。后来又对此概念作了修正,“任何具有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①一般认为,黑社会犯罪是最狭义、最典型的有组织犯罪。^②“黑社会”一词,在英文中表述为Underworld Society,而在黑手党故乡意大利的语言中的表述则为Mafia,尽管表述不一,但它们都含有卖淫、盗窃、放火等意思,可见其性质之恶劣是广为人们所熟知的。由于对大陆境内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尚难定论,我国现行立法只是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犯罪组织”,以此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③结合人们的惯有认知以及实际情况,黑社会是指秘密地控制一定地域,存在一定的等级制度,以获利为目的,有组织地通过武力或威胁,以及贿赂政府官员,^④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群体,至于黑社会犯罪,则可一般地理解为由黑社会实施的犯罪。^⑤此种犯罪虽然形式多样,但都具有组织形式严密、

地域性较强、犯罪目的较明确以及手段残暴等特点,因此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⑥

至此可知,跨境黑社会犯罪,是指跨越边境的,在我国特指跨越内地与港澳台地区间的,由黑社会实施的犯罪。

二、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的特征

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国情,使得我国跨境犯罪问题严重。而香港与澳门的黑社会,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回归后交流的日趋增多,在广东地区的跨境活动尤为频繁,粤港之间的跨境犯罪更是居于核心地位^⑦,因此,分析粤港澳地区间的跨境黑社会犯罪并提出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⑧

香港的黑社会称为“三合会”,起源于三百多年前由少林和尚所创的,以“反清复明”为目标“洪门”组织。“三合会”并非一个特定组织,而是包涵各大派系的、以“三合会”的组织原理和系统为基础构架的黑社会犯罪集合体的总称。二十世纪初,香港下层社会的江湖客、走贩、码

① 计永胜.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 [M].中国法学.1997. (4) .P115

② 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 [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P13-14.转引:陈明华.有组织犯罪问题对策研究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14-15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月12月5日颁布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 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2) 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3) 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 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④ 王大为.澳门黑社会研究之二:澳门黑社会组织的犯罪状况、组织类型、结构及特征.公安大学学报.1997. (4)

⑤ 马进保.跨境犯罪研究 [M].群众出版社.2002.P243-244关于黑社会的定义也是向来有争论的,可参见莫洪宪.有组织犯罪概念研究 [M].法学评论.1998. (3) .P83-89

⑥ 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

⑦ 王仲兴.大陆和港澳台跨境犯罪的基本特征 [J].政法学刊.1994.4

⑧ 由于我国大陆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尚未有定论,而广东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规模、发展历史、活动能力上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有较大差距,因此本文主要是围绕港澳黑社会在广东地区的跨境犯罪。

头工多聚在上环三角码头及湾仔两地,时常争地盘,抢主顾,聚众斗殴,一名来自大陆的“洪门三合会”成员借此筹建了第一个本地的三合会形式的组织,此后又有千余个类似组织成立,并被称为“堂口”。1908年各堂口成立联盟,并在各堂口名字前加一“和”字,成为日后“和”字头黑社会组织的前身。此后,香港黑社会经历了起起落落,至今形成了以潮州/鹤佬、十四K、和字头以及联字头四大类别为首的大小五十多个三合会组织。

澳门黑社会产生比香港还要早。鸦片战争后,由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的转运站所雇用的华人苦力工,在争权夺利和操纵地盘的纠纷中成立的“友谊馆”及“友乐馆”,并利用当时鸦片战争导致的澳门公共权力真空而迅速发展起来。后来,澳门经历了抗日时期的虚假繁荣、“九龙暴动”后香港黑社会成员的流入等时期后,其黑社会随着澳门的发展,尤其是博彩业的繁荣,形成了五十多个黑社会组织,三万多黑社会成员,当中以十四K、大圈、和胜义的“三联”为领导力量。澳门回归前夕黑社会犯罪活动猖獗。1997年,澳门开展打黑行动,经过数年艰苦斗争,澳门几大帮派首领,包括尹国驹等人被法院收监候审,黑社会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势力大大削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坚决打击和镇压的政策,彻底清除了大陆的黑社会势力,新中国也得以出现二十五年黑社会犯罪空白的良好历史纪录。^①但随着改革开放,境外黑社会也开始了对中国内地的渗透,重点对象是广东,首当其冲的则是深圳。早在1979年,港澳黑社会分子即以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深圳吸收成员,发展组织,1981年1月至1982年9月,广州、深圳、珠海、江门和中山共破获港澳人员入境作案的刑事

案件654宗,八十年代后期,港澳黑社会组织渗透进一步加剧,进入九十年代,香港的“十四K”、“和胜和”、“和胜义”、“水房”、“广盛”、“广联盛”等黑社会组织更加加紧渗透,仅深圳市就查获港澳台等黑社会组织25个,成员338人,主要是港澳的“十四K”、“水房”等等黑社会组织;查获“赤军帮”、“响马帮”、“三六帮”、“忍帮”等黑社会性质帮派组织62个,成员337人。而1999年5月广东公安机关侦破的以澳门“大圈帮”行动组组长叶成坚为首的暴力犯罪团伙、同年1999年11月至1月广东佛山公安机关打掉的以澳门黑社会分子曾启强为首的“水房帮”则是当中的典型。

港澳黑社会向广东渗透,使广东的黑社会犯罪呈现多层次交织发展的趋势,综合起来主要有五种类型:^②

1、直接入境进行犯罪活动。近年此种直接入境,从事绑架勒索、暴力讨债、盗抢汽车、抢劫杀人、金融诈骗等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日益增多,典型代表是1999年广州番禺祈福新村特大谋杀案。

2、与广东境内不法分子勾结,联合作案。此种类型的黑社会渗透活动不仅危害性强,且促进境内外黑势力合流,加速了境内黑社会性质组织向黑社会组织的转化。其典型代表是1999年的佛山“水房帮”案。

3、以合法名义入境,以商贸活动为名,建立据点,“洗黑钱”,操纵娱乐饮食业,进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一方面,黑社会组织的终极目的依然是金钱,因此他们进入内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进行牟利活动有必要性;另一方面,

^① 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1)

^② 马进保,跨境犯罪研究[M],群众出版社,2002.P258-261

我国处于资金缺乏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在大力引资的同时忽视对外资来源的了解,使黑社会成员入境进行“商贸”活动具实际可能性。典型代表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香港“广胜堂”成员陈诺权成立的、活跃于深圳沙井的“飞鹰帮”,投资经营酒店并以此为据点发展黑社会成员。

4、因逃避追捕进入广东,部分人员进入广东后继续犯罪。近年港澳警方加大对黑社会犯罪打击力度,并且港澳警方在打击黑社会方面经验丰富,因此不少黑社会分子逃入大陆躲避追捕。不少香港黑社会成员在香港犯案后潜藏到深圳、佛山等地避风;珠海拱北地区甚至被澳门黑社会势力作为解决纠纷的谈判场所、决斗地点。一些黑社会分子进入内地后本性不改,继续犯罪,如在香港犯有持械抢劫罪的“和胜和”成员何苏娣,在1992年进入广东后,三个月内实施了三次盗车犯罪。

以上四种类型,可以作为港澳黑社会渗透广东,实施犯罪的类型的基本划分,但是,许多个案都不是表现为单一类型的跨境犯罪,而是多种类型交织的跨境犯罪。如1999年佛山“水房帮”,其首要分子杨振林,也是为逃避追捕而进入广东的;又如深圳沙井“飞鹰帮”,即是以合法名义入境,其犯罪过程亦与当地不法分子相勾结。对跨境黑社会犯罪作类型划分的主要意义在于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

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最大的两个特征就在于一是空间上的跨境性,二是主体上的黑社会性质。进一步而言,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就目前而言指的只是港澳黑社会进入广东进行的跨境犯罪;而且,在广东与香港、广东与澳门这两组关系中,前者处于更为主要的地位,这是由人口、地理位置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①

此外,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同时也具有跨境黑社会渗透的一般特点,如成因上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安全的犯罪通道,活动形式上多采取合法的投资经商身份,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洗黑钱”,手段主要是内外勾结以及采取了政治渗透的方式。^②这些特点与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的类型划分是紧密联系的,在此不作详细叙述。

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如前所述,是乘改革开放之机而发展起来的。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进一步加强,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1、社会危害越来越大。由于黑社会分子大多是惯犯,且具有一定的犯罪经验,作案手段往往更为残忍、凶狠,甚至敢于与警方正面冲突。在港澳回归后,港澳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扫黑行动,因此两地黑社会组织加快向内地渗透,广东则首当其冲。典型的有深圳的“飞鹰帮”、“飞雄帮”、“暴风一族”,广州的“九龙帮”,惠州的“金钱帮”,汕头的“野龙帮”等,他们在当地实施抢劫、绑架、制贩毒、操控色情卖淫、聚众赌博,在农贸市场则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对经营人和客户进行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重大威胁。^③

2、公司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趋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黑社会进入广东发展势力过程中,

① 王仲兴,大陆和港澳台跨境犯罪的基本特征[J],政法学刊,1994.4

② 黄立,论境外黑社会渗透的主要特点及打击对策,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7

③ 马进保,易志华,港澳回归后跨境犯罪的特征及其防治对策,公安大学学报,2000.(6)

借用港澳本地黑社会的管理模式,实行公司化的管理;二是以投资为名,在广东地区设立公司成为港澳黑社会进入广东的主要手段之一,并通过“合法”公司进行洗钱活动。

3、骨干成员入境越来越多。八十年代港澳黑社会入境的犯罪成员基本上是组织社会最底层的一般成员,所犯罪行也带有较大随意性和偶然性,而近年来不少中层以上骨干分子入境进行渗透活动,表明其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渗透和转移。^①

4、入境发展成员对象低龄化、年轻化。帮派成员低龄化是近年全球黑帮的共同趋势,港澳黑社会为培养后继人,也把目光转向青少年,导致涉黑青少年罪案急剧增加。^②1993年深圳的“飞鹰帮”,就是由香港“广胜堂”成员陈诺权纠合沙井等当地无业青年形成。2002年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一书指出,境外黑社会分子入境发展组织,主要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发展物色的主要对象是农村青年、过境边民以及青少年,有的甚至把黑手伸向校园。^③而据澳门监狱长对澳门监狱内829名囚犯的问卷调查表明,家庭教育的缺陷及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心理偏差得不到及时、正确的矫正是黑社会犯罪形成的重要原因。^④因此,必须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港澳黑社会对境内青少年的拉拢、发展,尤其是广东青少年,一方面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而思想教育滞后而贪求享乐,另一方面接触港澳文化较多,受“古惑仔”思想影响较大,更易被港澳黑社会拉拢。

三、粤港澳打击跨境黑社会犯罪的对策

针对上述粤港澳跨境黑社会犯罪的现状、类型、特征以及出现的新趋势,笔者认为以下一些措施应当被充分考虑:

(一) 尽快在刑法典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中增加财产刑。财产刑是世国各国反黑立法所共有的刑罚手段,因为,“一般而言,罪犯从事不法活动之主要目的系为了牟利,以黑道(组织犯罪集团)为例,不论其犯罪形态为传统之包娼包赌,抑或新手法之军火、毒品走私、经济犯罪、利用犯罪资金以牟取巨大不法经济上利益,甚或使用庞大非法资金以漂白并挤身政坛,乃其一贯之犯罪演化方式。由此,惩治不法之徒如仅将其处于徒刑监于牢狱中,则因犯罪资产仍可由他人继续运用,可想而知对犯罪行为或犯罪集团之组织活动并无影响”。^⑤黑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是牟利,而足够的资产是黑社会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下,因此,增加财产刑应成为我国反黑立法的中中之重。

(二) 继续加强与港澳警方的合作。目前广东警方与港澳警方已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三地警方每年都召开警务工作会唔和刑侦主管会唔,研究三地共同关注的社会治安热点问题,并作出具体工作部署;设立了对口业务联络员制度及电邮专线等多层次情报通报制度,实现情报共享;联合行动前,三地警方进行工作会唔,研究行动方案,交流情报信息,交换跨境犯罪线索及通缉犯名单,并对境内外黑社会组织操纵的重点行业、

① 黄立,论境外黑社会渗透的主要特点及打击对策,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7

② 彭邦富,香港黑社会组织的现状与趋向(三),公安大学学报,1996.(4)

③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Oct/217406.htm>,网上中国。

④ 周长军,王海平,全球化时代的黑社会犯罪-港澳台黑社会犯罪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史哲,2005.(4)

⑤ 苏南恒,防制黑道之利器-罪犯财产没收分享制度简介,台湾:法务通讯,(1796).转引自: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P154-155

场所进行摸查；行动中，三地警方集中优势警力，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合作侦破重大涉黑跨境犯罪案件。

广东警方与港澳警方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联合办案程序，还将港澳台通缉犯、境外黑社会分子及活跃的黑社会头目列入了“黑名单”，一经发现便遣送出境，限制再次入境，先后遣送了港澳台籍涉黑犯罪人员853名，对境外黑社会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可以说，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正在全面展开。^①

然而笔者认为广东与港澳两地的合作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广东警方在强调情报共享的同时，必须积极学习港澳两地的派遣“卧底”打入黑社会内部获取情报的制度安排和经验，无论如何，争取早日建立自己的“卧底”情报体系；二是与港澳两地的合作，不应当局限于广东的警方，至少应当将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学校有限度地纳入粤港澳的情报共享系统，在不影响警方工作、不涉及重要机密的前提下，及时、有效地将相关情报，尤其是港澳黑社会中出入广东边境的成员名单报送各级人民政府与学校。

将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学校有限度地纳入粤港澳的情报共享系统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以合法名义入境，以商贸活动为名是港澳黑社会进入广东的重要手段之一，此种手段将随着粤港澳三地联合打黑力度增强而更广泛地被黑社会分子利用，因此，让各级政府掌握一定的情报，了解出入境的黑社会分子，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投资人的身份进行鉴别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青少年是黑社会分子入境发展组织的重要对象，而且，实证研究已表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心理偏差是黑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让学校掌握必要的情报，及早发现学校周围出现的黑社会分

子，并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汇报，既能有效地阻止港澳黑社会入境发展组织，又能防止境内黑社会组织的形成。

（三）在各级人民政府中开展反黑思想教育活动，增强对黑社会渗透的免疫力，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密切监视企图拉拢政府官员的黑社会分子的活动情况，并形成层层上报制度。

对公共权力的腐蚀是黑社会其中一个广为认可的特征，港澳黑社会也不例外。我省已有学者指出，跨境黑社会分子寻求权力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烈，^②在曾启强一案中，佛山市司法机关已发现了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称兄道弟的警方蜕变分子。^③有研究黑社会的学者指出，黑社会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无法与强大的政府相抗衡的，因此，与公共权力的勾结，是黑社会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④因此，无论是在打击跨境黑社会犯罪中，还是在广东境内进行反黑活动，保持公职人员，尤其是各级政府与警力的廉洁性，都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甚至可以说是基础。只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责任感，我们的公职人员洁身自爱，打击黑社会犯罪只是方法与措施的调整问题；一旦我们自身丧失原则，公共权力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那么，打击黑社会犯罪势必事倍功半，甚至无法根除。

（责任编辑：黎熙元）

① http://gd.dayoo.com/gb/content/2006-03/21/content_2446999.htm, 大洋网新闻:黑社会跨境犯罪无恶不作,粤港澳联手打黑

② 马进保,易志华.我国现阶段的跨境犯罪及其防治对策.河北法学.2001.(2)

③ 侯俊杰,曾大进.港澳台黑社会组织渗透破坏和跨境犯罪情况浅析.政法学刊.2001.12

④ 康树华,魏新文.有组织犯罪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P259-261

民建联：

《强化即时转运》报告的读后感

郑天祥

民建联于2006年11月公布了《强化即时转运，推动物流业持续发展》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笔者读后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及时的“报告”，不仅将大大推动香港物流业的发展，值得香港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和作出回应；也会推动大珠三角区域物流的合作与发展，值得内地，尤其是珠三角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笔者最为欣赏的是“报告”提出的17项可供政府操作的具体建议，这17项建议几乎都与内地有关，实施这些建议，无疑必将巩固香港在国际物流市场和大珠三角区域物流市场的领先地位。笔者从大珠三角区域物流发展的角度补充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研讨。

1、即时转运是目前香港物流业的最大优势和最大卖点，但高成本问题不化解，内地物流效率不断提高，2020年香港怎能达到4020万个TEU的吞吐规模？因此，在发展即时转运的同时，必须全力化解高成本问题，才能与周边物流业竞争。

过往20年，香港出于效益，只专注货柜运输，而忽略大宗货运对就业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带动，将综合枢纽港的地位拱手让给了广州港，2006年广州港货物总吞吐量达到3亿吨，跃居世界第5位，而香港只有2.3亿吨。今后香港若再放弃大宗货柜

运输，只专注即时转运，就会继续自我边缘，不出5年，不仅失去世界第一货柜港的宝座，很可能沦为世界第四，次于上海、深圳、新加坡。要研究为何香港出现货柜业“黄昏论”之时，却有新加坡货柜公司高价收购和黄在葵涌码头20%的股权。

即时转运规模有限，也难以解决香港的就业问题，而且即时转运适合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高档鲜活产品的转运，这些产品将越来越转向航空运输，仅有即时转运，香港的港口就难以发展。

2、“报告”没有建议下力气发展香港本土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使其在即时运输中占一定比例，可能是民建联已在2006年2月公布了《香港发展新工业的建议》。香港的物流业不能完全依赖内地货源的转运，否则风险太大。“报告”也没有提到如何协助内地打开高档鲜活产品如花卉的国际市场，这个市场的潜力很大，而内地缺乏国际经营网络。今后，内地将大大增加进口，以平衡贸易顺差，香港应利用国际网络优势，争取成为内地的国际采购中心。

3、“报告”引用摩根士丹利2005年的预测，

（下转第47页）

畅所欲言、集思广益，

香港明天会更好

——“香港回归1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多天 杨 广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香港回归1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16-17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广东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北京、湖南、江西、广州，还有香港、越南和日本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现将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香港经济发展方面

关于实施CEPA的影响。来自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叶金凤委员认为：香港回归十年以来，两岸三地的政治情势仍不断的产生变化，二〇〇四年内地与香港正式实施之CEPA，因系属同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两个关税区间所签署，又系大陆向香港打开内地市场大门的一种地区倾斜的特殊安排，故对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确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效益。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李媛媛博士、冯邦彦教授从CEPA对港澳与内地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与合作，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内地制度建设与政策调整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CEPA实施的区域效应，又从零关税、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分析了CEPA实施的行业效应影响，最后从CEPA本身的内容设定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度变迁的成本，服务业中的金融、旅游行业升级发展产生的阻碍等方面揭示了CEPA的存在问题，提出尽管内地经贸交流规模日益扩大，但最终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合作集团还要有相当长的路的发展趋势的判断。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周运源教授在论述香港践行CEPA的绩效及对两岸的经济关系的论文中提到：1.利用香港全面实施CEPA的成效与影响，推动和发展两岸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关系；2.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功能作用，加强两岸的金融交流与合作；3.两岸贸易向“直接”、“双向”模式的发展，是新时期加强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必然选择；4.理性应对台湾当局经贸投资“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等观点。

香港经济转型与服务、贸易发展和资讯科

技经济问题。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陈广汉教授、张应武博士生论述了香港经济转型的现状与未来的路向,总结并分析了香港回归后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以及香港经济转型面临的困境:1.放任自由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该有所作为的矛盾;2.高增值、高效率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失业或草根阶层收入改善的矛盾;3.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重新调整经济发展路向的矛盾。最后提到在经济转型中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也可以有所作为并提出了香港经济未来的发展要坚持多元化方向:一方面,发展高科技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在发展高增值服务业的同时重视消费性服务业对就业的积极作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宋恩荣教授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香港作为内地加工出口营运中心的作用与前景:加工出口的发展符合内地和香港的长远利益。就内地而言,虽然早期的加工出口的增值率很低,但近年加工出口的毛利率有所提高,外资的比重也稍为下降,说明中国优化加工出口和自主创新的政策初见成效,发展加工出口并非死胡同,毋需长期依赖外资及生产低增值产品。就香港而言,虽然外发加工的毛利率正在下降,可是香港所得的总附加值仍有可观增长。来自中国银行(香港)的谢国樑学者论述了对回归10年内香港金融的认识,他从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三个层面检视主权回归以来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态势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过去十年香港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开放,资本市场地位的提升以及金融体系效率的改善值得充分肯定,但金融创新水平是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展望未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仍然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来自日本北九州岛市立大学的王效平教授从国际经营学角度探讨了香港作为国际商务中心地位的职能和地位在主权回归之后的变化,利用统计资料和对日资跨国公司访谈心得,

分析了主权回归问题对跨国公司在香港的营商环境的影响,香港如何因应国际环境变化提高自身竞争力等问题。香港科技经济研究院院长朱杰民以翔实的案例回望了“数码港”计划等资讯科技业的发展经历并总结说:现在的香港的资讯科技产业经济,虽然主体已在正常发展,如电信市场、互联网应用及软件开发等。但相比国内及周边其它地区,香港优势已明显不再。

关于香港发展前景问题。暨南大学封小云教授对香港发展前景发表了看法:1.回归10年对香港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中国人世,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两地的关系,而香港后10年的发展会比过去的10年更加重要;2.中国的发展拐点是2006年,人世5年的过渡期就此结束,“狼”真正来到中国,促使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香港的前景如何就在于如何适应中国发展的拐点。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郑佩玉教授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她提到要分析香港的前景,就要思考:1.香港发展的方向在哪里?高技术的发展是由高利润支撑的,香港真的没有优势吗?2.香港政府的定位在哪里?3.CEPA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关系是什么?特区未来将以何种姿态如何面对世界?

二、关于香港政治、法律方面

关于香港“一国两制”问题。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杨允中教授提到:香港特区十年发展表明,由基本法所规定的现行特区政治体制及循序渐进发展民主模式,作为当代新型政治文化的创新产物经得起历史检验,令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以保持效益最大化、运行有序化。在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社会稳定受到挑战情况下匆匆加速所谓民主进程,只能适得其反,因加得减,得不偿失。从长远观察,香港一定能成为法治更加健全、民主意识强烈、民主保障到位的现代文明先进地区。香港特区十年发展表明,作为发育相当

充分的现代资本主义,香港的多元化定位至关重要,坚持与尊重香港居民的多元选择与多元思维同样重要。无论经济与社会发展都要强调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香港的“长”和“优”在于其中西、东西方之间两大优势的合理嫁接,在于正确利用区位优势 and 体制优势不失时机地把经济效益提升、把居民实际福祉提升,在于对市场效率与效益的高度重视,在于在不同价值标准中作出适度平衡。因而可以讲,香港的生命力与活力或竞争力很强,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参照,有“一国两制”的保障,香港绝对有条件、有机会继续成为国际级经贸、金融、航运、旅游、会展、文化多重服务与交流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齐鹏飞教授论述了“在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他还认为尽管在政治发展方面遭遇到“二十三条立法”和“双普选”等问题的严重挑战,在经济发展方面遭遇到金融风暴和非典型肺炎袭击等“天灾人祸”的严重挑战,但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一国”与“两制”、“变”与“不变”的反复磨合中,不仅通过了能不能“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初步考验,而且,“香港明天更好”的愿景已经是在现实中呈现,“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在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

关于《基本法》和其他法律问题。香港城市大学梁美芬博士认为,在实施了《基本法》以后,香港的法律文化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基本法》事实上是一部成文法律,因此它也使得香港的不成文宪法转向“成文”宪法。究其篇幅和内容而言,《基本法》在各个方面都比《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更为全面。而且,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通过,最终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它具有很多与众不同

的特征,这些特征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中国法律的特征。然而,在《基本法》当中,有很多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普通法的特征和香港终审法院的解释权和裁判权。《基本法》实际上反映了普通法和中国法传统的本质。同时亦反映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共同特性,是一部具有高度创新价值的文献。来自香港并在清华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的邵善波学者作了“《基本法》下的行政与立法关系”的主题发言,他提到中国政府是建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基础上。中国也是一个单一制的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一个授权的关系,《基本法》就是一种授权法。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饶戈平教授论述了基本法与香港繁荣稳定的关系,他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有赖于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这种保障从根本上说就是香港《基本法》。《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度化、法律化,是香港的宪制性法律。基本法充分尊重香港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为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做出了制度性保障。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蒋朝阳副教授提出了在制定法和判例法传统下,司法机关审理案件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各自存在不同的司法推理和司法解释的逻辑路径,从而导致不同的解释结果。基本法在两个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司法解释实践表明,以与基本法所处的制定法传统不同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基本法,有可能导致法官创造的新的基本法规则,所以,不宜用普通法的方法解释基本法的观点。中山大学法学院郭天武、黄琪两位学者提出了有关“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协议”的问题,他们提出: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权冲突是客观存在并有协调的必要,平等协商后签订管辖协议的模式是目前解决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有效途径。之后分析了管辖协议的合理性、原则与具体内容及其运作过程,主张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签订区际管辖协议,同时由专门

的区际协调机构负责解释协议,逐步地建立统一的区际刑事管辖权制度体系。

关于政府管制、政党发展、政治发展问题。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郭敬文理事从香港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大派福利;港英政府从本质上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为特区政府管治加入难题两个方面分析香港过渡期的经济及政治格局开始,并以经济及政治层面入手,探讨香港特区成立初期香港经济危机重重背景下的部份管治问题。广东行政学院周建华副教授认为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政党获得了比回归前更大的发展空间,对香港政治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它在发展中受着诸种因素的影响,使其发展道路并不平坦,这预示着它未来的发展将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澳门科技大学林媛博士分析了“行政主导体制下香港特区的政治发展”,他指出香港回归后,确立了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虽然通过《基本法》奠定了行政主导体制所需要的制度和法律基础,但面对着“港人治港”条件下部分市民要求“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实行双普选”等民主诉求,使政府坚持行政主导的治理手法不断受到民主政治发展的冲击。为了顺应政治形势的变化,需要关注由于扩大立法会直选对行政权主导可能带来的影响,也要注意政党政治发展对行政长官管治可能带来的阻碍等问题。

三、关于香港社会文化方面

关于香港社会福利、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广西大学的蒋超副教授提到福利机构的设立是福利事业发展的前提,其数量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福利事业发展的水平。与香港相比,内地的福利机构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目前还不及香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香港的有关制度对福利机构的设立有着与内地不同的激励机制。他通过对比香港与内地在福利机构设立

模式上的制度差异,论述了内地应该如何改革相关制度,走出福利机构发展的瓶颈的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成文、胡彬彬两位学者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分析了香港的“后福利社会”的政策模式的选择,指出香港走的是一条“后福利社会”的道路。“后福利社会”这种模式是在考虑了弱势群体的需要和权利及传统华人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相对于“福利社会”这一模式而言,更加强调个人职责和多元供给。受这种模式的影响,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是由政府与第三部门共同推动的,并实现了形式上的多样化,即货币福利与福利服务的齐头并进。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刘祖云教授和刘敏学者对香港的贫困问题作了研究,他们认为:1.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2.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3.尽管存在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但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系的谭兵博士,以香港弱势群体及针对该群体的社会援助体制为论述对象,分析了弱势群体与社会援助的一般涵义,香港弱势群体基本构成、分类及特点,以及香港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体制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香港社会援助体制的特点及对内地在构建针对弱势群体的制度建设上的启示。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田北海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近代以来的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特点: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是在特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受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轨迹表明: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是影响社会福利支出水平、主体构成、模式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因素是影响社会福利改

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历史因素是探寻社会福利模式形成与变迁的重要线索；从一定意义上讲，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福利模式有趋同的可能，但这种“趋同”不是指工业制度理论所说的“工业国家公共养老金支出的显著增加”，而是指福利主体的多元化。

此外，关于教育、社会流动和中产阶级问题。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黄枝连教授认为，根据《基本法》，可以把“一国两制”当着一一种制度的资源，对高等教育本身进行突破性的改造；并且从这里开始，同中国内地以及东盟等地的“大学之道”进行对接；教育理想，教研体制，营运方式，网络协作等方面，推陈出新。如此，既可促进东亚地区的高教事业及学术研究，更可使大学的教研——咨询活动，同所在地和区域的社会发展连系起来。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黎熙元、庄丽华两位学者根据2006年11月通过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作的一项电话访问资料，通过香港代际和代内职业流动状况描述分析了香港近30年通过职业变动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状况。指出后转型期香港的代际职业变动与社会流动的特点：香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高，中层以下尤其显著，反映阶层结构具有开放性，其中教育是大致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从这一结论出发就能更好地理解在收入分配两极化明显的香港社会中，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如何仍然被多数人接受。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王建平副教授分析了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特征：中产阶级是特定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职业分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成为香港中产阶级形成的关键。在社会特征上，香港中产阶级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与突生性，他们具有以个人主义定向的两面性，是拥护开放、进步、自由、思想的代表，属于温和、知足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上是不情愿激进式的保守主义。香港中产

阶级形成与发展中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关系、政府积极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以及公正、合理的教育机会与就业设置给未来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于公屋制度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向德平、姚霞两位学者认为：住房问题的实质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制定适当的公共房屋政策，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是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香港通过公共房屋制度，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当地的城市住宅（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并从运作、管理、公共房屋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分析了香港的公共房屋制度的成功之处，探讨了其对内地房屋运营模式、房屋政策等的启示。

(责任编辑：黎熙元)

信息动态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关资料显示：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主办的“我看香港回归十年”大型有奖征文活动颁奖仪式，于2007年07月2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郭东坡、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获奖作者代表、征文活动评委及各界嘉宾等共100多人出席了颁奖仪式。

经过征文评审委员会的认真评审，共评出特别荣誉奖3名、一等奖8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20名及优秀奖100名、纪念奖200名。15名征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内地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和香港知名人士组成。

这次征文活动具有来稿范围广、地域跨度大、作者年龄跨度大、身份多样、文体多样等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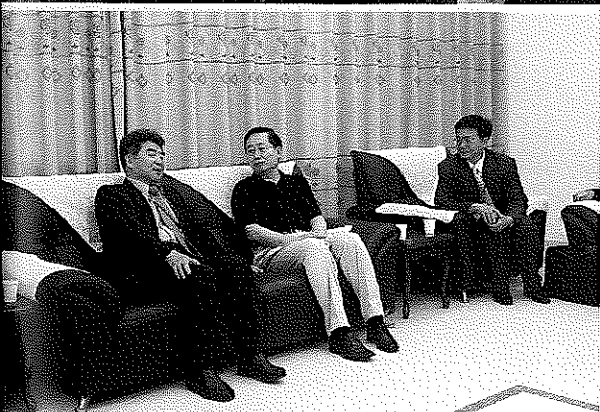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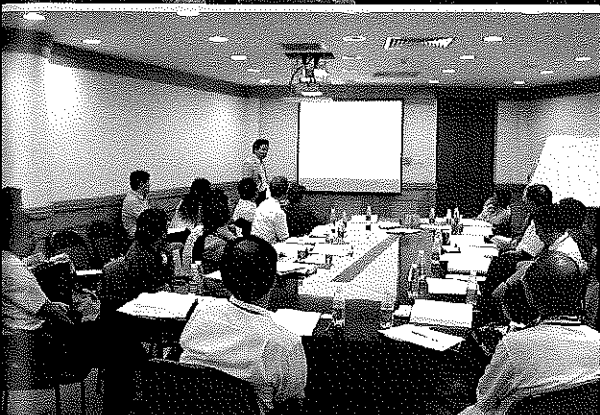
在来稿中，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具体真实地反映十年里香港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深远意义及影响，许多作品观点新颖、视角独到。

国家广播电影总局副局长胡占凡在颁奖仪式上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在媒体中率先举办“我看香港回归十年有奖征文”是一项很有创意的活动，它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所有关注香港的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平台，得到了六千多人的积极响应，取得圆满的成功，体现了国家媒体的号召力。”

在此次“我看香港回归十年有奖征文”的活动中，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周运源教授的论文“繁荣发展人心聚，再领风骚向未来”，在6539篇应征论文中荣获2等奖，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郭东坡亲自为周运源教授颁奖并合影。

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国际学术研讨会





“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 6. 16